

美國共產黨反華言論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美国共产党反华言論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5年·北京

• 内 部 读 物 •
美国共产党反华言論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 3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字第 101 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五) 0.65 元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4 $\frac{5}{8}$ · 字数 103,000

1965 年 11 月第一版 1965 年 1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 · 757

出版者說明

自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7月14日給各級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有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屈从苏共领导的指揮棒，进行了猖狂的反华宣传运动。据不完全的統計，到1964年7月，已经知道有六十个党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反华材料，其中包括这些党的中央的決議、声明和公报，主要领导人的报告、讲话和文章以及党报党刊的社論等等。这些言論，象苏共領導和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論一样，信口开河，造謠誣蔑，內容荒謬絕倫，言詞粗野恶毒，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使我們的党员，我們的人民，了解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了解这些党的領導怎样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們現在象出版《苏联报刊反华言論》一样，将这些党的主要反华言論輯为专集，陸續分册出版，以供讀者閲讀利用。

本书包括美国共产党自1963年7月15日至1964年11月的材料，共計十五篇。书中的小标题、异体字和着重記号等等，都是原文发表时就有的。

目 录

丹尼尔·梅森:

中国立場的实质是反对任何禁試 1

《政治月刊》社論:

莫斯科禁試條約(节譯) 6

《政治月刊》社論:

論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立場 13

亨利·溫斯頓:

永不熄灭的灯塔(节譯) 39

伊丽莎白·葛萊·弗林:

1960年两次會議的回忆 41

理查德·洛林:

論历史上的左傾主义 66

詹姆斯·杰克逊:

和平是首要的(节譯) 72

《政治月刊》社論:

肯尼迪被暗杀,人民为什么哀悼?(节譯) 77

葛斯·霍尔:

談中国最近的声明 80

美国共产党声明:

共产党人的目标必須是全世界工人的團結 82

——馬克思主義的團結有利于和平和社会主义

詹姆斯·杰克逊:

对七百名大学师生讲话中有关中国党部分 84

| | |
|-------------------------|-----|
| 葛斯·霍尔: | |
| 两个支流——一条河水..... | 85 |
| 葛斯·霍尔: | |
| 未来的意识形态..... | 88 |
| 葛斯·霍尔: | |
| 意识形态冲突的目前状况 | 107 |
| 海曼·路默: | |
|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 124 |

中国立場的实质是反对任何禁試

丹尼尔·梅森

过去几个星期以及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談判期間和談判前後那些天发生的事态，揭露了中国政府领导人攻击苏共和世界上絕大多数共产党的真正用意。

为了支持意识形态上的站不住脚的立場而从列寧的言論中搜集合适的、然而孤立的引語的做法被放弃了，断章取义地摘引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的言論的做法停止了，曾被用作誹謗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的借口的替罪羊“铁托集团”被丢在脑后了。

下面这个冷酷的事实已经暴露了：中国政府领导人不想要禁止核試驗條約或者其他任何有可能緩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行动；他們露时会破坏全世界的和平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以阻挡任何走向和平共处的步骤。

中 国 的 立 場

他們的立場的核心赤裸裸地表現在北京《人民日报》一星期前的星期六的一篇社論中。

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发言人在那篇社論中猛烈攻击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是一个“大騙局，旨在束縛中国手脚”。

这个條約的目的是制止核武器試驗，而且人們希望世界各国都将在它上面签字，这样一个條約怎么可能束縛中国的手脚，使它不能謀求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正当的目的呢？

中国政府领导人在这种看起来令人费解的反对态度中发现自己同法国的独裁者戴高乐将军和以阿登纳为首的新纳粹和垄断资本家的西德政权连结在一起。

戴高乐不願签署禁試條約，因为他不想停止他自己的核武器力量的发展，这样他就能够靠威胁赢得世界地位。西德政权之所以感到忧虑，是因为这个條約将使它难以得到它想用来进行复仇战争和征服世界的核武器。

害怕緩和

中国政府领导人显然感到苦恼，因为他们认为部分禁試條約对于加速核武器竞赛和他們自己的原子武器試驗是一个障碍。上述北京報紙的社論表明了这一点。它說：

“这个條約的中心目的，就是要通过部分禁止核試驗，使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內，不能增强自己的防御力量，以便美国更加肆无忌憚地对这些国家进行威胁和訛詐”。

但是情况竟是，中国政府领导人代表著唯一没有把这个部分禁試條約当作走向全面彻底裁軍和和平共处的重大的第一步而加以欢迎的“爱好和平”的国家。

他們认为这个條約“旨在束縛中国的手脚”的論点，同美国的參議員巴里·戈德华特之流的极右分子、參議員約翰·史坦尼斯之流的白人优越論者以及高級軍官們所抱的看法十分接近。这些和平的敌人声称，禁試條約将束縛美国的手脚，五角大楼将无法进行必需的核試驗或发展新的原子武器，无论如何不能給予信任的俄国人将因而变得更强大。

想要一个武庫

中国政府领导人显然希望能随意地准备一个进行核战争的武庫。正如上周末苏联共产党在《真理报》的一篇社論中所說的那样，中国政府领导人认为他們可以“在正义战争这个崇高的革命口号掩盖下进行任何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赌博”。

但是，正如《真理报》社論所警告的那样：

“中国的‘理論家’并不认为这种政策可能导致世界范围的核灾难这一点有任何巨大的害处。他們宣称，对于那些幸存者來說，‘前景是美好的’。”

无疑，正是由于核武器有扩散到中国和其他十个或更多的将来可能建立原子武庫的国家的危险，中国邻邦緬甸的外交部才主张，不但实际生产核武器的国家應該在禁試條約上签字，将来有可能生产核武器的国家也應該签字。亚洲的領袖、联合国秘书长吳丹也在莫斯科的條約签字仪式上把禁止核武器扩散定为下一个目标。

孤 立

中国政府领导人現在发现自己在禁試條約問題上陷于孤立。这使他們如此恼火，以致他們把一切关于国际忠誠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門面話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們甚至沒有任何进行理論論证的資格就开始了一次侮辱和誹謗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以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的运动。

他們正在号召和阴谋推翻苏联政府并撤換不同意他們的危

险路线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

上星期的北京《人民日报》赤裸裸地表明了这一点；它在社論中譴責苏联“自願听任美帝国主义夺得軍事优势”。接着又說：

“因此，苏联人民的利益被出卖了，社会主义陣營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的利益被出卖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被出卖了。”

“无可爭辯的事实表明，苏联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是：联合战争力量，反对和平力量；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各国人民。”

但是中国政府领导人一面假冒为善地誹謗和平共处的拥护者，一面却继续肆无忌憚地破坏一切希望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團結起来的組織。今年早些时候，他們曾企图削弱莫斯科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爭取和平的运动的力量。

这种做法，上星期初在广島甚至表現得更加明显。在那里，中国代表們破坏了日本反对原子弹和氢弹委員会组织第九届世界反对核武器大会的工作。这次大会原定在上星期二（8月6日）开幕，这一天距离二十万男女老幼在美国轰炸机投下的第一枚原子弹之下喪命的那一天正好十八年。

中国人通过他們在日本委員会內的外围人員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以致該組織終于不得不把这次反对核武器會議的发起者地位放弃并让給广島的分会。

誹 謗

數千名和平进军者同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在广島汇集。他們在就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达成的協議的鼓舞下充满

了希望，但是他們不得不在上星期日听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赵安博誣衆試條約是“一个使反对核战争运动陷于瘫痪的阴谋”。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领导人也在千方百计地破坏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团结和效能。

在这方面，他們得到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主义的叛徒的支持。

事实已经证明，他們用来粉飾他們的目标的那些左傾辭句，主要是对那些孤立的和思想混乱的知识分子具有吸引力，这些知识分子由于他們自己的失敗而寻求迅速而不負責任的解决办法。

布鲁斯·伦顿在8月2日的伦敦《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的关于中国人的破坏活动的报道，表明了中国的立場究竟有多大的号召力。伦顿写道：

“托洛茨基分子虽然在工人和农民中似乎沒有得到多大支持，但是在罗馬的意中友协区——他們在那里被称为巴里奥利共产党人——和艺术中心馬古塔街却有很大的势力。中苏爭論在国际上可能是一場引人注目的爭論，但是在罗馬則以威尼斯街上的一次古巴式鸡尾酒会而告終。”

（譯自1963年8月11日美國《工人报》）

莫斯科禁試條約(节譯)

《政治月刊》社論

莫斯科條約的意義甚至超出了這個重要問題的範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以及非洲和亞洲新獨立的主權國家和其他愛好和平的國家的代表，曾經在聯合國會場的內外不止一次地堅持說，社會制度相對立的國家之間能够達成可以為雙方接受的協議。如果在謀求解決方案時具有決心同時又能滿足雙方的切身利益，這些方案是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實現的。莫斯科條約的簽訂表明，難以解決的國際問題可以通過不損害任何國家的民族利益的談判達成協議。因而它有助於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並為解決其他隱藏着威脅世界和平的危險的嚴重問題創造比較有利的氣氛。

莫斯科條約的確可以成為改善東西方關係的起點——是在爭取防止熱核災難的鬥爭中進步的重要的一步。

的確，正如三個簽字國的主要政治家們所承認的，莫斯科條約並沒有結束核戰爭的不祥的威脅。莫斯科條約並沒有結束軍備競賽，沒有結束核武器的進一步的儲存，這些儲存已經足夠消滅整個文明好幾次而有餘。莫斯科條約並沒有免除不斷增加的軍事預算的負擔，也沒有結束由於希特勒所謂的蘇聯是“世界和平的威脅”的謠言而保持著的冷戰。

但是莫斯科條約是冷戰體系中的第一個缺口——是一個值得歡迎的預兆，預示著在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中能夠取得進展。

無論人們對國務卿迪安·腊斯克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上所作的要求批准莫斯科條約的證詞還能說些什麼，他的那個“正因

为战争能吞沒世界，战争已把自己吞沒掉了”的說法，却正是对这个核时代的战争性质已经起了质的变化这一事实的早应提出的承认。为了自己活下去，就必须让别人也活下去——在两个不同的、敌对的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里，摆脱核战争的唯一出路就是和平共处。

在持续了十八年的冷战体系中的这个缺口，并不是自己出現的。它是那些把和平事业置于所有其他事业之上的、广大的和日益增多的群众，日复一日地坚持进行禁止核試驗和核武器、結束冷战、爭取普遍彻底裁軍的斗争的結果。莫斯科條約之所以是——正如我国共产党主要发言人葛斯·霍尔所着重指出的——“全体人类和爭取世界和平的崇高而神圣的事业的巨大胜利”，道理就在这里。它是一个可以轉化为更多的胜利的胜利，是一个促进和平事业的新的斗争的基础。

戴高乐有保留

人們預料，在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和北美洲，将有一百多个国家批准这个條約。但也将有某些国家不予批准。

在帝国主义阵营里，最頑固的反对意見来自法国戴高乐独裁政权，西德新納粹复仇主义集团只是在勉强的、帶有很多条件的情况下才表示接受的。

戴高乐毫不拐弯抹角地表明他坚决反对莫斯科條約。在他所发动的那个力图重振法国久已失去的“声威”的运动中，他决心发展法国的独立核武庫。戴高乐无视法国人民和世界輿論的意志，已经宣布要在太平洋进行大气层試驗，并在1970年（如果需要的話）获得核独立。甚至肯尼迪所提出的向法国提供核知识的合作建議也遭到了直截了当的拒絕。

戴高乐宣称，“法国将坚定不移地以其他大国所拥有的那种破坏力不可估計的手段装备自己。”（《紐約时报》，1963年7月30日。）

西德阿登納政府一直在玩弄若即若离的手法。它对它支持條約这一点开出了高价：“严格保证”條約不会导致在世界范围内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也不会导致締結一項維持欧洲国家地理边界現状的互不侵犯條約。它坚持，只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才是有权代表东德和西德人民說話的唯一代表。实际上，波恩統治集团是反对緩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只有在保持冷战的情况下，它才能指望作为美国帝国主义在反对“苏联威胁”中的最富侵略性和最可靠的軍事盟国而染指核武器。

英美两国欣然姑息西德的事实，表現在两国政府过于匆忙地通知苏联說，他們不能接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签字，因为他们不承认这个共产党政权。这种作法是违反这样一条公认的国际法的：在一个條約上签字并不意味着承认任何地区或国家的主权。

中 国 反 对

令人不安和震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采取的立場——这个立場显然是同戴高乐政府的立場、西德新納粹軍国主义匪帮的立場，以及我国的伯奇和戈德华特之流的立場一致的。中国政府走得如此之远，竟然說禁試協議是一个“大騙局”，是“出卖”世界人民和各国的利益，是“背叛”社会主义。它以荒謬的論据反对條約說，條約將加剧战争的危险。它爭辯說，條約加强了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限制了目前并不拥有核武器的社会主义国家”。它誹謗苏联向美帝国主义“投降”。

当然，一个决心要在那个由于内部矛盾而四分五裂的帝国主义阵营内加强自己的竞争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坚持认为只有发展自己的独立核武库，从“实力地位”出发，才能保持自己在世界上的地盘，这是一回事；而一个致力于各国平等与和平共处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也坚持同样的立场，并且无视任意地扩散核武器对世界和平的危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是很明显，中国政府领导人也的确意识到，对禁試條約抱完全敵視的态度是不得人心的。因为在他們猛烈地指責这个條約是走向战争的一步的同时，他們又走上前来，发出呼吁，要求世界各国政府召开世界會議以考慮“全而、彻底、干淨、坚决地禁止和銷毀核武器”。中国政府建議拆除軍事基地和从国外撤回一切核武器和运載工具，建立太平洋、中欧、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无核区，禁止輸出和輸入核武器和技术資料，停止包括地下試驗在內的一切試驗。

沒有一个馬克思主義政党会对实现这些目标的紧迫性发生疑問。然而，这些建議既不是新的，也不是第一次被提出的。人們都知道，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人們就一年又一年地提出这些建議以及其他无数的建議，并为它們的实现而斗争。远在1946年，在广島和长崎扔下原子弹以后不过几个月（那时，几十万生灵遭到的可怕屠杀和摧残事实上还没有打动人类的良知），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并銷毀現有的庫子武器儲存。当时，美国帝国主义不容爭辯地壟斷着原子武器。人們也尚未充分认识到由于这种大規模杀人武器的“科学的”发现而造成的战争性质的质变。因此，苏联的号召沒有引起注意。

在苏联打破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并且很快地建立起科学上和技术上的軍事优势以后，又是苏联为一切国家停止使用核武

器、停止制造核武器和銷毀核武器儲存而进行无情的斗争。苏联深信它表达了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切身利益，它通过赫魯曉夫总理出席联合国，提出了一个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广泛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一切爱好和平人们的支持。

走向和平的步骤

当然，每一个人，首先是共产党人，都愿意一劳永逸地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裁军成了各个大陆和平运动的要求的中心。显然，人们越来越懂得，只有没有武器的世界才是没有战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国家都能体面地、平等地、安全地和和平地生活。但是，正如生活所表明的，如果裁军和裁军所要求的禁止核武器不能一下子就实现，那么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难道就应当站在一旁而听任事情自然发展吗？在帝国主义接受整个一揽子建议以前，难道就应当坚持不同帝国主义匪徒来往吗？这种立场能推进和平事业吗？

当然不！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上，而不是在一个我们希望出现的世界上，采取这种态度将是自杀——是对全人类的利益的背叛。在各帝国主义政府继续抗拒人民的意志的情况下，和平必须一步一步地争取，是的，必要时必须一寸一寸地争取。

这意味着为争取部分的解决而斗争，为争取一次解决这一个或那一个问题而斗争。特别是这意味着，人民依靠他们在数量上的优势，必须坚持不懈地迫使最好战的帝国主义政府接受他们的意志，迫使它们一次又一次地退却。

中国政府的立场实际上是自相矛盾和自取失败的立场。一方面，它争论说，禁试条约是“骗局”，因为它并没有宣布核武器非法。另一方面，它争论说条约加强三个核国家的垄断，并且要

求消除所有的限制，以便其他国家发展核知识。如果一个人是主张取消核武器的，他怎么能同时又要求让其他国家得到核储存呢？中国人是不是在主张世界范围的核武器竞赛呢？这种竞赛会促使世界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社会主义、殖民地独立和世界和平吗？这种建议果真能促进为裁军而进行的斗争吗？

当在走向和平的痛苦道路上所采取的每一个局部的步骤都受到诽谤和责难的时候，世界和平的事业是没有保障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每一个使裁军成为世界工会运动、青年和妇女联盟、世界和平组织的中心问题的建议，他们警告说，裁军运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幻想”。中国共产党人给每一个关于结束核试验的要求扣上向核讹诈“投降”、在人民中间散布恐惧和听天由命的情绪、按美帝国主义的吩咐办事的帽子，尽管这项要求已列入万隆会议和八十个党的声明中。

中国共产党人不幸走错了路。他们把世界和平的斗争说是和平主义运动。他们没有研究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具体条件，也没有研究那里人们的觉悟程度，只根据和平运动没有直接同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好战的性质作斗争这个理由就缩小目前和平运动的范围。当世界和平在加勒比海系于千钧一发之际，他们就诽谤危机的解决，说这是“慕尼黑”、是“牺牲古巴主权来同美帝国主义妥协”。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又胆敢指责苏联“为了推行‘和平共处总路线’，为了同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支配世界人民的命运，同美帝国主义做交易”。（第三十二期《北京周报》）中国政府1963年7月31日的声明完全无视目前的现实，轻率地宣称：

“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苏联政府执行的政策是：联合战争力量，反对和平力量；联合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各国人民。”

这些話的含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現在已经成了力图击败新成立的苏联—帝国主义联盟的世界革命力量的“先锋”。正是从这种錯誤的观点出发，才說莫斯科條約不是为实现和平而跨出的一步，而是苏联制造的“阴谋”，旨在麻痹反对核战争的斗争，以便“巩固三国对核武器的垄断”来反对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这种政治性的誹謗只对鼓吹战争的人才有帮助。

問題的真相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立場是同人类的切身利益背道而馳的，因为对禁試條約的热情支持意味着，人們认识到这个措施是苏联坚定不移的和平政策的重大胜利，是一个完全符合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切身利益的措施，是世界帝国主义好战的、侵略成性的集团的失敗。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自称替它們說話的那些国家——只有极少几个孤立的例外——都将在莫斯科禁試條約上签字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禁試條約抱敌对态度的根源在于，他們始終否认在今天的世界上能够实现和平共处。这反映他們低估了世界力量对比的改变，低估了社会主义与和平陣營对帝国主义与战争力量的日益增长的优势。这是一种只能导致失敗主义的政策，也是一种认为除了各国重新进行核武装以外便沒有其他出路的政策。

(譯自1963年9月号美国《政治月刊》)

論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立場

《政治月刊》社論

今年1月9日，美国共产党发表了一篇关于去年10月加勒比海危机的声明——《古巴危机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载1963年1月13日《工人报》），对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危机中采取的立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中共以一篇题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的社论作了答复，这篇社论载于3月8日《人民日报》。美共曾发表简短的公开声明，指出这篇社论完全误解和歪曲了美共的观点，并且说，鉴于中共和苏共即将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而且美共觉得在那时应当停止公开论战，因此那时不愿作出答复。

但是，鉴于自那时以后情况有了剧烈的变化，我們觉得現在必須作出詳細的答复。这篇社論要討論中国社論提出的那些主要意识形态問題和一些有关的問題。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意识形态的爭执现在已经爆发为公开冲突。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完全全地使自己处于同苏联共产党及全世界几乎所有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信奉的意识形态路线直接和根本对立的地位。

随着中共中央6月14日信件和苏共中央的答复的先后发表，这场辯論已经完全展現在公众的面前。在这以前，中共对包

括美国共产党在内的其他一些共产党进行了尖锐的公开攻击。但是在这两封信已经发表和莫斯科会谈已经破裂之后，中共就一直在变本加厉地把它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其他政党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彻底敌视的态度公开表示出来。它的攻击越来越粗暴，越来越露骨，使用的语言越来越恶毒，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人民日报》9月6日发表的文章，对苏共二十大的各项论断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这就使人们看出了中国立场的全部含义。十分清楚，这场冲突已经远远超出共产党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而带上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其余部分的基本观点和政策进行全面攻击的性质。

禁試條約

中国党对最近签订的部分禁試條約所进行的猛烈的謾罵式攻击，最明白不过地表明了它所持的反对态度已达到了甚么程度。不管这个條約有怎样的局限性，它的簽訂已被世界各地的亿万人民看作是朝向和平共处迈出的极受欢迎的第一步，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到处有人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认为从此再也不会有放射性微粒污染大气了。到处有人热切地期待着继续向世界和平前进，而这个條約的簽訂已经为以后的步骤铺平了道路。有一百多个国家在條約上签了字，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反动政权，它们这样做，只是因为不敢违反人民的这种情绪。

但是，中国领导人却没有这样做。在他们看来，这个條約只是“麻痹和欺骗……世界人民”的一个“骗局”。他们称條約是“背叛”，是“假和平”。他们誹謗苏联政府“出卖了苏联人民的利益，出卖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出卖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誹謗它执行“投降外交”等等。他

們进行了沒有止境的謾罵。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人也反对这个條約。在美国，最恶毒反对这个條約的是戈德华特和伯奇协会會員之类的人。带头反对批准这个條約，攻击條約是“政治理伏”并且只能散布“和平幻想”的，正是戈德华特。指責和平共处这个概念本身的，也正是戈德华特。在国外，條約受到了像戴高乐和他周围的极端分子之类的反对。中国共产党正是同这批名声很臭的人一道对條約进行可耻的攻击，而这批人則是資本主义世界中最狂热的好战分子。

应当怎样解释这种情况呢？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怎么会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发生冲突，而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站在一起呢？

出現这种令人吃惊的事态，其根源是很深的。根源首先在于，中国领导人反对1957年十二个党的宣言和1960年八十一一个党的声明所表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路线。不錯，中国领导人不停地强烈宣称他們完全遵守这两个文件所表明的路线，而且同样不停地指責其他的党抛弃这两个文件。但是真相是，正是他們在事实上反对这些文件对新的世界力量对比所作的估計和从这一估計中所得出的結論，特別是反对实现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尽管他們在口头上假装接受这些东西。

八十一一个党的声明說：

“在現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

在这个基础上，声明断言：

“能够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实现他們的世界战争計劃的时候已经到来。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

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努力能够防止世界战争。”

声明更进一步說，如果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继续发展，而且取得絕對的优势，那么，“在这些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資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現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現實可能性。”

正是对这种新的世界力量对比的认识，构成了現阶段各国共产党政策的基础。我党的政策也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的。1959年12月我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決議是以这样一些話开始的：

“当我们迈进六十年代的时候，人类正在跨进一个新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消除战争灾难和解放人类全部生产潜力以解决許多年来的貧困、疾病和无知的可能性。这些新的可能性的产生，是由于世界上发生了有利于和平陣營、自由和社会进步的深刻的、不可抗拒的改变。”

这也是我党1960年8月关于和平共处決議的主题。

“和平共处是唯一符合今天世界情况的政策。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就开始的世界关系的根本变化，是不可能扭轉的。主要的历史趋势仍在继续发展着，在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摆脱帝国主义統治而独立、有利于民主和进步力量的情况下继续发展着。我們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土崩瓦解的时代。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兴起、巩固和最后取得胜利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世界上反帝力量的实力必然会继续增长，避免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战争以及把和平共处确定为长期政策的实际可能性也必然隨之增长。在这样一个时代，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和平和裁軍是能够作为可以實現的目标而爭取的。”

但是，中国党却另有看法。它在9月6日的文章中說，为了提出这一政策，赫魯曉夫在苏共二十大“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是否继续有效的問題，在实际上篡改了列宁的学說。”因此，簡言之，中国领导人是不接受八十一个党的声明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立場的，不管他們怎样喋喋不休地說他們是坚持这种立場的。

凡是认为世界和平和裁軍是可以实现的目标的人，对于限制核武器扩散的每一个步骤，不管有多大的局限性，都只会表示欢迎。正因为中国领导人拒絕这种做法，正因为他们事实上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們才认为解救人类的唯一办法是把核武器扩散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他們自己要获得核武器，而且把防止这种扩散的一切努力誣蔑为旨在永远保持核垄断的大阴谋。正是因为这样，他們才发现自己同戈德华特之流結成了一伙；戈德华特把和平共处看作是神話，因而反对一切走向裁軍和禁止核武器的行动。但是，这种态度很难称做为和平而斗争。相反，它只会增加战争的危险。

当然，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另一种办法。他們裝腔作勢地要求世界同意宣布一切核武器为完全非法并加以彻底銷毀。这个建議并不新鲜。这个建議曾经多次由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并得到各地維护和平的人士的支持。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現實的目标。

但是，中国领导人現在是把它作为一下子可以实现的目标提出来的，并且是用来反对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必須采取的那些部分步骤的。的确，部分禁試的好处主要在于为采取进一步的步骤鋪平道路。鉴于这一点，鉴于中国领导人一貫嘲笑裁軍是除了作为一个宣传口号以外別无意义的幻想，我們只能把中国党的拥护全面禁止核武器看作是掩盖他們反对禁試條約的实质的

一种手段。

是馬列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中国领导人立場的根子还在于，他們背离了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而走向民族主义。用葛斯·霍尔的話(《唯一的抉擇：和平共处》新世紀出版公司1963年版)來說，“在某些馬克思政黨成为国家領導者以后，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似乎在削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些党倾向于以狭隘民族主义的眼光看待包括社会主义世界在内的世界其余部分”。中国共产党的著作和言論，经常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現出这一点。

中国党认为，今天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社会主义世界，而是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中心的矛盾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殖民地与附属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6月14日的信这样写道：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統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它还进一步写道：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說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終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轉移。”

当然，誰都不能否认最近几年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出現的汹涌澎湃的形势以及这种形势对整个反帝斗争的重大意义。但是，如果看不到这种形势对社会主义世界的发展和巩固的依賴，如果不承认国际阶级斗争对这种发展起着根本的和决定性的作

用，那就是当了民族主义的俘虏。

中国领导人說，“东风压倒了西风”。根据这种看法，他們进而认为，今天世界上的根本冲突是有色人民同白种人民的冲突——这种立場包含着十足的种族主义色彩。

正是这样一种看法，使得中国党把苏联限制核武器发展和扩散的努力說成是“大国沙文主义”，并且說这些努力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止中国获得这种武器。这样看来，中国领导人是仅仅根据他們自己能否获得核武器，也就是根据他們狭隘的民族利益，而不是根据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整个被压迫人民和和平力量的利益来考虑問題的。显然，这种态度只会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只会按照民族和种族的界线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和平和进步力量的团结。

但是，中国的领导人走得更远。他們认为整个世界的冲突基本上是世界上其余部分同美帝国主义的冲突。他們說(見《紅旗》杂志1963年第三、四期合刊上的文章《再論陶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

“美帝国主义者企图在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它所追求的这个大帝国，不但直接奴役西德、意大利、日本这些战敗国和它們原来的殖民地、势力范围，而且要直接奴役英国、法国、比利时等这些战时的同盟国和它們原来的殖民地、势力范围。

“就是說，美帝国主义者所企图建立的这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它的实际行动，首先是在夺取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极其辽闊的中間地带。同时也采用各种手段，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破坏和侵略活动。”

当然，认清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力量堡垒，认清建立世

界霸权是华尔街冷战計劃的基石，这是正确的。但是，关于包括所有其余帝国主义国家在内的一个“辽闊的中間地帶”的概念却是对情况的一种民族主义式的歪曲，因为这个概念把世界冲突的实质看作是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以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个概念导致了不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整个帝国主义而仅仅指向美帝国主义的看法（而且重要的是，在中国发表的所有文件中，这种倾向都是突出的）。它忽视了英帝国主义的作用，来自西德帝国主义和法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威胁以及共同市場的帝国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它反而导致了以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为名而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建立机会主义的联系。对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來說，尤其是对美国的这种力量來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中心的斗争。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場将削弱而不是加强这一斗争。还必須說，在中国领导人对禁試條約的反对和他們所表現的那种日益强烈的反苏情緒中，都体现着这种作法。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的最后結果。这导致在革命的詞句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路线的掩飾下机会主义地向帝国主义投降。这是民族主义同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交织在一起——它們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中国党对当前世界关系的錯誤估計和由此产生的对于据說是从过去一个时期的关系中得出的結論的教条主义式的坚持，以及它的起腐蚀作用的民族主义——这一切都体现在它对所有問題的立場上。而且，这一切使得中国共产党不仅大肆歪曲其他国家的情况，而且还捏造和歪曲其他各党的立場。事实上，这就是《評美国共产党声明》这篇社論的中心特点，我們現在就来看一看这篇社論的內容。

加勒比海危机

这篇社論用了相当多的篇幅为中国在加勒比海危机中的立場辯解，我們在1月9日的声明中已表示反对这种立場。这篇社論說：

“我們支持古巴革命政府的五項正义要求，反对轻信肯尼迪的假‘保证’，反对把‘国际视察’强加在古巴身上。我們始終把斗争鋒芒对准着侵略古巴的美帝国主义。我們既沒有主张把导弹武器运进古巴，也沒有阻挠从古巴撤出所謂进攻性武器。我們既反对冒险主义，也反对投降主义（斜体字〔中文用仿宋字〕是《政治月刊》标的）。試問：我們的这种正确立場有什么可非議的呢？怎么能說是‘导致热核战争的政策’呢？有哪一点同美帝国主义的路线相‘吻合’呢？”

这篇社論还說：

“你們把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中国同志叫做‘假左派’，我們要問，你們心目中的真左派又是什么呢？是不是拿別國的主权去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就叫做真左派呢？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才是貨真价实的假左派，真右派。”

1月9日的声明，霍尔所写的小册子《唯一的抉擇：和平共处》和最近1963年8月份的《政治月刊》的社論《美国左派中的思想斗争》以及其他許多文件，都詳細地闡明了美国共产党的立場。不需要把这些文件全部加以重复。在这里，我們只希望強調下列几点：

上面引的两段話只是中国原来的立場的重申，其中用斜体字（中文用仿宋字）标出的那些話是我們提出的批評所依据的主要部分。中国人只是简单地把这种立場当作当然“正确的”立場

而加以重申，并沒有提出证明。但是情况真是这样嗎？

因为这里重申的是：苏联設置导弹是犯了冒险主义的錯誤，撤出导弹是犯了投降主义的錯誤，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又犯了践踏古巴的主权以便同帝国主义妥协的錯誤。然而，从最近的事态发展看来，这些說法在今天比在最初提出来的时候更站不住脚了。

这种“投降”的結果不是毁灭了古巴的主权，而是防止了侵略的威胁，并保住古巴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继续存在下去，这难道不是一种奇怪的“投降”嗎？而且被认为是受害者的人却不认为这是投降，相反地却欢迎苏联的行动，认为这是无私的援助和真正国际支援的光輝榜样，这难道不是一种奇怪的“投降”嗎？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利用他的国家的“主权”“作为政治交易的籌碼”的反应，竟然是像他1963年6月4日在电视广播中所說的“这种休戚相关的精神全面表現了出来，为此，苏联冒了巨大的危险。苏联人民同意作巨大的牺牲。他們毫不犹豫地为我們的国家而冒这个危险”，这难道不奇怪嗎？

已经十分清楚，古巴的自由得到了有效的保卫，肯尼迪政府被迫取消了它的入侵計劃。但是，中国人却一直坚持把这种結果描绘为是古巴人民不顾苏联的做法用某种方法取得的。1963年1月11日《北京周报》刊載的邵铁真的一篇文章《革命的辯证法和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这样說：“两个月前，美帝国主义者在加勒比海上制造紧张局势，企图扼杀古巴革命。但是，在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下，英雄的古巴人民进行坚决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保卫了主权，保卫了革命。”

但是，这不是真实情况，因为它略去了那个决定性的因素。当美帝国主义阴谋推翻危地马拉民主政府的时候，危地马拉人民也有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但是这并沒有制止帝国主义实

現它的計劃。在古巴事件中，制止他們的是由于苏联在古巴政府同意之下所采取的行动而出現的可怕的現實。那就是，如果他們坚持他們的作法，他們就不仅将同古巴对抗，还将同苏联对抗，并且使他們自己的領土陷于遭受报复性打击的危险。正是由于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使肯尼迪政府中的一部分人清醒起来，并迫使肯尼迪退却和妥协。也正是由于认识到这一点，使得不入侵古巴的保证不是那么太“虛假的东西”。

不承认这一点，而继续攻击苏联所起的作用，恰好与美帝国主义的方針相吻合。指责苏联“投降主义”，恰好鼓励了垄断資本的最反动的一部分人；他們爭辯說，事情的結果证明战争边缘的“强硬”政策是正确的，因此应当进一步加紧奉行这种政策。

还有，如果说設置导弹是“冒险主义”、撤走导弹是“投降主义”，那么应当采取什么别的办法呢？要么是根本不應該在那里設置导弹，对付入侵威胁的准备工作仅限于武装古巴人民，让他们仅仅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道义支持下自己去打仗。正如我們已经指出的，这种力量悬殊的斗争会造成什么样的結果，是显而易見的。要么是一旦在那里設置了导弹，就不再撤走，而用死拼的办法去对付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采取这种行动的結果同样是显而易見的，我們1月9日的声明非常正确地指出：“《北京周报》的一些社論強調說本来应当奉行的政策是‘針鋒相對’的政策，并且发出关于‘投降’和‘慕尼黑’的指責。这些社論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只有一个含义：应当用死拼的办法对付隔离和轰炸的威胁——总之，应当采取一項导致核战争的政策”。而且仅仅在口头上坚持說自己的方針“正确”，不論說多少遍，也不能改变这一情况。此外，把危机的責任推在苏联身上，其作用就是宣布真正挑起危机的美帝国主义沒有責任。

美共和肯尼迪政府

《評美國共產黨聲明》這篇社論的主要部分，全面攻擊它所謂的美共對肯尼迪政府的立場。它說，“相當一個時期以來，美國共產黨一些領導人，在他們的報告和言論中，極力美化美帝國主義，極力美化美帝國主義的頭子肯尼迪，並且極力表白自己對美國統治階級的忠誠。”

然而，他們真正提出來的是對美共立場的徹底歪曲。而且，這種歪曲只能說是有意的，因為他們完全斷章取義地把孤立的句子、一句話的一部分甚至一個字抽出來連綴在一起，以便使它們與原話的意義完全不同。而且有許多地方，這些支離破碎的引語的出處也沒有說明。下面幾個例子就說明了這種有意歪曲的作法的性和意義。

(一) 社論說：

“他們贊賞肯尼迪提出的把美國勢力範圍擴展到世界六大洲的所謂‘新邊疆’思想，說‘象肯尼迪那樣談到新邊疆是好的’。”

這個支離破碎的引語摘自葛斯·霍爾的一個報告(《今日世界中的美國》，1961年2月號《政治月刊》)中的下列一段話：

“象肯尼迪那樣談到新邊疆是好的。但是，在冷戰的道路上是不可能有什么新邊疆的。如果新政府要想找到新邊疆，它就必須制訂一條新的路線。根據我們對世界事態發展的研究和了解，我們堅決相信，美國的新邊疆確實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我們的方針是走向結束冷戰政策並開始實行以和平共處、結束殖民主義、實現裁軍和和平為目標的政策時，才能如願以償地找到這些新邊疆。”

十分明显，这远远不是“赞赏”肯尼迪的思想。相反，这显然是反对他的思想的。

(二)社論說：

“他們称贊肯尼迪号召美国人民作出牺牲来推进美帝国主义事业的就职演說，說这‘是走向和平道路的一个可能的开端’。”

上面这句话引自丹尼尔·梅森发表在1961年1月29日《工人报》上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

“肯尼迪的就职演說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欢迎，他們认为这是走向和平道路的一个可能的开端。在苏联，电台和報紙最广泛地报道了这个演說。”

这同社論所說的显然是不一样的，因为这只是單純地报道了世界上的积极反应。但是爭論的問題超出了这个范围，爭論的問題是：这种反应是对的嗎？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种积极的反应不是針對整篇演說的，而是針對其中的某一点的。这一点扼要地表現在下面这段話中：“所以，讓我們重新开始——双方都要記住，有礼不表明軟弱，誠实总是有待于证明。讓我們永远不要出于害怕而談判。但是，也讓我們永远不要害怕談判。”

問題是人們对于这样的话应当作出什么样的反应，特别是在向美国人民說話的时候。人們可以立即把这些話忘掉，认为这不过是同其他言行相矛盾、目的只是在于掩飾美帝国主义侵略目的的一篇煽动性的演說。人們也可以考慮一下迫使肯尼迪发表这个演說和产生上述有利反应的群众压力和其他因素，并在这个基础上投入加强这种压力和要求实施所表明的立場的斗争。

第一种态度只能导致宗派主义地孤立于和平运动之外。第

二种态度則把共产党人同人民群众的和平运动联系起来，利用每一个哪怕是很小的机会来推进和平事业。中国党显然喜欢前一种作法。我們則毫不犹豫地选择后一条道路，并同那些欢迎每一个和平开端的人們合作。

(三)社論說：

“他們认为，‘肯尼迪政府的主要群众支持’是‘工人阶级、黑人、和平力量’，并且一廂情願地把希望寄托于肯尼迪政府‘朝着和平和民主的方向改变政策’。”

前半句話不是說明政策而是說明事实的，这个事实从1960年的选举結果以及其后的种种发展中是很容易得到证明的。这句話是从一个政策声明（《极右派、肯尼迪，以及进步力量的作用》，1961年7月16日《工人报》）中摘出的，这句話的上下文是这样的：

“肯尼迪政府奉行一种自相矛盾的方針，采取这种方針是由于美帝国主义地位不稳定、由于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主义力量、反帝力量与和平力量日益增长）——肯尼迪政府认识到了这个新的变化，但是沒有作出充分的和适当的評价。它的方針搖擺不定还由于我們本国人民群众的压力，特别是来自曾经是它的主要群众支持并把它选出来的工人阶级、黑人和平力量的压力。”

这只是在研究了美国政府的言行及其原因以后对美国政府的立場作出的一种評价。我們的政策和策略必須以这种評价为依据，而不應該仅仅以对美帝国主义的本性和作用的抽象籠統概念为依据。

社論的那后半句話は伪造的，政策声明中有关的全文明明是这样說的：

“肯尼迪政府遵循这种方針（即“冷战、干涉和全面反对民主

的方針”)是因为这个政府是受它为之服务的垄断资本家和金融家控制的。必須牢牢记住这一点。但是，尽管要认清它已经采取了进一步限制民主权利的措施，如果就此认为肯尼迪政府目前已走上了法西斯道路，却将是一个严重的錯誤。”

把肯尼迪和极右派适当地区别开，是所有左派和进步人士所面临的中心策略問題。要这样做并不简单。肯尼迪并不是罗斯福。自从他当选以来，他一直在朝反动的方向走。但是，他并不是必然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从而給极右派提供更广泛的机会。

如果策略問題得到正确的解决，那就将有可能对极右派关死大门、击败极右派，并迫使肯尼迪政府本身朝着和平和民主的方向改变政策。

这远不是“希望”有这种改变；而是要求采取群众行动来迫使这种改变。这是以下面的估計(到1962年年中为止)为基础的：(一)存在着一个受到垄断资本的某些部分和国会中的右翼分子支持的法西斯极右派，必須认真地把它看作是对和平和民主的威胁；(二)肯尼迪政府不属于这一派，虽然它目前在向右轉，但是它的态度中包含着由于前面列举的因素而产生的心理矛盾和犹豫不决的成分；(三)对政府施加的群众压力再加上对极右派进行的集中攻击，可能起到迫使政府改变方針的作用。

这样区别垄断资本的不同部分作为决定群众斗争适当策略的基础，并不是新鲜的作法；利用这种差别，是统一战线这个概念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作法本身不是为了“美化”任何人。进行评价的唯一适当的基础是，看评价是对还是错，社論对这一点連談都不談。

而且，去年的事件证明，我們的评价是正确的。肯尼迪政府在某些重要方面已被迫改变了它的方針。

它至少在目前已经不得不放弃侵犯古巴的任何計劃。在这次改变方針以后，它还采取了走向和平共处的其他步驟。其中主要的一个步驟是肯尼迪在6月10日演說中所表示的新态度，而最重要的是最近締結的禁試條約。同样，对黑人爭取权利的斗争也改变了方針，政府被迫从原先的态度作了一些让步，并且以建議中的民权法案使联邦政府承担了更大的保卫黑人宪法权利的責任。就是这样一些发展，其客观后果对美国人民來說都是很重要的。

(四)社論說：

“他們从肯尼迪1962年宣布加速武装起来实现美国独霸世界的目标的国情咨文中得出結論說，肯尼迪政府‘能够被迫接受来自人民的压力’。”

这句话摘自一篇通篇激烈批评这一咨文的文章（阿納德·約翰逊：《肯尼迪的計劃》，1962年2月号《政治月刊》）。那篇文章在上面这句话以后紧跟着說：

“自然，总统設法用諸如‘爭取进步联盟’和‘自由的挑战’或‘新边疆’之类好听的詞句掩盖美帝国主义的图謀。这些詞句的煽动性质是很明显的。尽管这样，肯尼迪政府仍然有可能被迫屈服于人民的压力。只有加强这种群众压力，加强同简单地‘让总统来办’这种幻想进行的斗争，才能促成美国政策的真正改变。”

又一次，一个要求采取群众行动以迫使肯尼迪政府从冷战政策后退的号召，被断章取义地歪曲成了一种暗含着要依赖肯尼迪政府的政策。

(五)社論說：

“他們在評論肯尼迪1963年要用核訛詐建立美国領導的‘法治世界’的国情咨文时，竟然鼓吹肯尼迪所說美国‘追求的不是一个国家或一种制度在全世界的胜利，而是人类在全世界的胜

利’，把这种騙人鬼話說成是肯尼迪‘对于世界現實的认识’，‘大多数人听了都高兴’，并且‘激起了希望’。”

这里又一次描出了一幅完全不真实的图画。引語的来源是梅森在1963年1月20日《工人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为《肯尼迪增加战争预算，忽視社会目的》。这篇文章詳細批評了咨文，在指出咨文的特点时說了如下的話：

“总统对劳联一产联要求实现每周工作三十五小时以减轻失业情况一事进行了从侧面打击的威胁。对于絕大多数人民，他建議削減必然会减少联邦社会服务的那些預算。

“但是为那些軍火大王們，他却建議增加几十亿美元的軍备开支。他表面上贊成和平，但是沒有提出会使通向和平的道路平坦的任何建議。”

在这两段以后，文章接着說：

“大多数人民高兴地听到总统說：‘因为我們追求的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制度在全世界的胜利，而是人类在全世界的胜利。現代的地球太小了，而它的武器毁灭性太大了，它的騷乱太容易传播了，因此不能容許任何其他种类的胜利。’

“但是，这样一种对世界現實的认识所激起的希望，却被关于需要加强美国軍备以实现人类在全世界胜利的那些条件所粉碎了。”

又一次，引話和原話之間的差別是令人痛心的。对此没有必要再加以評論了。

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歪曲？

我們相当詳細地說明了我們的立場所受到的歪曲（这种情况还有很多），以表明这种歪曲不是偶然的、无意的，而是一貫

的、有意的，其目的是要把美共领导人描绘成“美帝国主义心甘情愿的辩护士”。中国党为什么要花这样大的力气来歪曲事实，把我们描绘成这样一副不真实的形象呢？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他们自己对战后美国的局势发展作出了错误的估计。

那篇社论要人们注意十二个党的宣言和八十一一个党的声明中对美帝国主义所下的结论，并且根据这两个文件把它说成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这一切无疑都是真实的。但是人们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特别是在这个堡垒内部——那里绝大多数人民还看不到这一点，而且也不接受上述评价——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人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人们可以像中国领导人明显地建议的那样，机械地和教条地应用宣言和声明中的结论，并且断言，既然这些事情对整个美帝国主义来说都是真的，那就必须认为垄断资本的每个部分，它的每个发言人都同样是反动的。这样，人们就不能在他们之间作出任何有意义的区别，而必须把相等的打击力量指向他们的各个部分。此外，人们还必然得出结论说，垄断资本中最危险的部分就是现在控制着联邦政府的那些人，因此打击力量也必须集中于这些人。

这种宗派主义的态度，是出于对美国国内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力量和范围作了完全过高估计，这在中国党所作的评价中是看得很清楚的。例如，上面引过的邵铁真文章说，“在战后，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更加反动和腐朽了，它在国内开始推行法西斯统治，民主自由的影子在逐渐消失，这就引起了美国人民越来越多的反对（斜体字[中文用仿宋字]是《政治月刊》标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甚至在麦卡锡主义最为盛行的时候，也不能说

民主自由已经蕩然无存。事实证明，反麦卡錫的情緒具有足够的力量，在統治阶级内部具有足够的优势，使麦卡錫頽然下台，从此默默无聞，并結束了他进行政治迫害的生涯。

这篇文章同样夸大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力量的范围和强度。文章說：“美帝国主义的这种國內国外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就像一座火山，每时每刻都威胁它自己，随时有爆发革命的可能。”这完全是异想天开的情景。无论是現在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沒有絲毫理由說，在美國國內，存在着一座随时会爆发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公开革命的火山。

中国领导人沒有正确地了解美國國內力量对比，只是他們沒有正确估計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并坚持以过去的眼光估計当前形势这种情况中的一部分。他們不去充分地考慮下面的事实，那就是，作为帝国主义时代固有特点的資本主义衰落和社会主义兴起的这一过程，必然会引起具有深远后果的变化，这在别的地方和在美国都是一样。

如果一个人从上述的教条主义态度出发，他就不得不认为，那些不是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名义出現的人民群众运动都是以幻想为基础而拒絕这些运动，以免掉进改良主义的泥坑和放弃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內容。这恰恰是中国党所采取的立場。它坚持这个立場竟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它要求世界和平运动明确表示反对帝国主义，作为它参加这个运动的条件。

我們十分坚决地拒絕这种立場。采取这种方針，就会把自己孤立于群众的爭取和平、工作、民主权利的斗争之外；群众是根据他們目前对这些問題的理解进行斗争的。这将是拒絕參加他們的斗争，而形成只对一小部分已经是左派的人有吸引力的狭隘的、宗派主义的组织和运动。这将是坐在一旁进行徒劳无益的劝告，企图使人民相信他們在浪费时间。这将是把有觉悟

的分子从群众斗争内部排除出去，而听任群众受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最后是什么事情也不做——“坐在一旁”，等待“落后的”群众觉醒。

从另一方面看，可以采取这样的道路：参加这些群众运动，并在其中策划一条朝着希望中的方向发展并逐步导向加强群众反垄断资本、反帝国主义的觉悟的行动路线。在参加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的过程中，可以帮助人们认清美帝国主义在古巴、越南和其他地方所扮演的角色。凡是在客观上对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冷战政策形成一个打击的每一个行动，不論参加者的觉悟程度如何，都可以为它的成功实现而出力。

帝国主义反动派害怕的正是这种作法，而不是大談抽象的一般原則和革命詞句。南部黑人赢得投票权这一点，对于南部民主党人和他們在北部的反动伙伴的势力所形成的威胁，比无论多少激烈的言詞和要黑人反帝的虔誠劝告所形成的威胁要大得多。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要发展其工作中的革命內容，正是應該去同这样一些运动建立联系，而不是仅仅向帝国主义破口大罵。

要以这样的态度进行工作，就需要随时对垄断资本阵营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作出具体的評价并加以利用。对群众运动和群众斗争說来，这种分歧和矛盾并不是无关紧要的。相反，这种分歧和矛盾在一切統一战线的斗争中都是一个极关重要的因素。

这一点在三十年代垄断集团的內部分歧中看得很明显。当时，以罗斯福为发言人的那些分子认为向工人让步是挽救資本主义的最好办法，而以自由联盟为中心的那些分子則求助于法西斯主义。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的分歧中也看得很明显。当时，垄断集团中的某些分子认为同苏联結成联盟是保全美帝国主义的最好办法，而另外一些分子則反对同苏联联盟，认

為我們是在進行一場“錯誤的戰爭”。

今天，這一點在下面的分歧中也看得很明顯：那些反對封鎖或立即進攻古巴的人同那些擁護這些措施的人之間的分歧，那些支持禁止核試驗的人同反對的人之間的分歧，以及肯尼迪對民權問題的態度同華萊斯州長的態度之間的分歧。

這些分歧的根源是壟斷資本中各個具體部分的不同利益和它們在策略上的分歧。由於統治階級遇到的困難愈來愈多，由於世界反帝力量愈來愈壯大，由於帝國主義的目標同它實現這些目標的能力之間的差距愈來愈大，這些分歧便加深了。而群眾鬥爭的浪潮——和平運動、黑人自由運動以及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的浪潮——的高漲，則越發加深了這些分歧。

美國政府在言論和行動上的矛盾，其根源正是上述的這類考慮。無論肯尼迪總統在某一個特定場合宣傳和平、裁軍或其他進步目標時帶有多大的煽動性，這些言辭都反映了壟斷資本所面對的困難和日益加重的群眾壓力。群眾運動的任務是抓住這些話所提供的機會並利用這些機會去推動鬥爭。

美共的政策和策略，正是根據這種作法制定的。中國領導人明顯拒絕的正是這種作法。顯然，正因為如此，社論才竭力把這種作法描寫成“美化肯尼迪”和“甘心充當美帝國主義的辯護士”。也正因為如此，社論才歪曲我們的立場，以便硬拿我們的立場去適應他們那些空想的、教條式的概念。

黑人爭取自由的鬥爭

在黑人爭取自由的鬥爭方面，中國黨對美國狀況的歪曲特別顯眼。在南部對黑人施加恐怖暴行的首先是華萊斯、巴內特、伊斯特蘭之流和其他的南部民主黨種族主義分子，給他們撐腰

的主要是全国其他地区的极右派。肯尼迪政府沒有采取行动对付这些种族主义分子，也沒有采取坚决措施以击潰这种恐怖暴行，所以也是有罪的。黑人充分了解这一点。但是中国党却极力把压迫黑人的主要責任推在肯尼迪政府身上。

中国工会領袖劉寧—8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談到“肯尼迪政府鎮压黑人斗争的法西斯暴行”（見1963年8月16日《北京周報》）。这个大会以支持8月28日华盛顿的示威的名义拍給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美国其他一些組織的电报說，肯尼迪政府“是残酷迫害黑人的罪魁，是种族歧视制度的維护者，是向全世界推行民族压迫和侵略政策的禍首。”它还說：“肯尼迪政府上台以后，野蛮鎮压美国黑人的罪行更是层出不穷，駭人听聞”。（見1963年8月23日《紐約时报》）毛澤东在8月8日发表的声明（見1963年8月16日《北京周報》）也断言，肯尼迪政府“在国会里提出一套所謂‘民权計劃’，企图麻痹黑人的斗志，欺騙國內群众。”

毫无疑问，肯尼迪政府在这方面沒有作为，應該受到严厉批评并且應該負很大責任。它曾经試圖以象征性的让步撫慰黑人，以便继续保持种族主义的南部民主党人对它的支持。甚至在伯明翰的无辜儿童慘遭杀害的情况下，它还是一味地頑固拒絕在南部充分使用联邦权力和軍事力量。而且，它的民权法案也有許多缺陷，它为这个法案的通过进行必要斗争的决心也很不够。

尽管如此，把肯尼迪政府說成是“法西斯暴行”的“罪魁”和主要凶犯，却完全是顛倒事实。8月28日的示威，是华盛顿或美国任何其他城市从未看到过的一次令人感动的、引起人們敬畏的人道主义情緒的傾泻。它主要不是針對肯尼迪政府，而是为了支持毛所說的“所謂民权法案”的。此外，在这次示威之后，还

将展开全面斗争，以粉碎預料中南部民主党人为了阻挠通过这个立法而将采取的拖延議事日程的手法。

把肯尼迪政府看作是一个法西斯政权而集中力量对它进行斗争，以此来表示支持华盛顿的示威或黑人爭取自由的整个斗争，这对于黑人的事业不会有什么益处，反而是帮倒忙。这样做只会导致宗派主义的孤立，只会使黑人的运动同它在白人群众中的天然盟友分裂而不是加强他們之間的联合，并且只会导致黑人运动軟弱无力。中国共产党这种立場使它同美国的极左翼分子結合在一起。那些极左翼分子贬低华盛顿示威的意义，譴責它的领导人向政府“出卖”黑人的斗争，提出通过武装冲突解决为黑人爭取自由的斗争問題这种煽动性的要求。

站在反动派一边

在辯論的过程中，中国党一再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提出捏造的污蔑，說它們“跟着苏共的指揮棒轉”，那就是說，它們按照苏共的指揮說話行事。这种論斷总的說來对任何共产党來說都是不恰当的。不过，当他們指的是我們这样一个党时——它正在反对誣指我們是“外国代理人”的麦卡伦法以保卫自己的生存，它的领袖和黨員正遭到长期徒刑和巨额罰款的威胁——那就尤其不恰当了。中国领导人大声表明他們支持我党进行这种斗争。的确，他們的社論埋怨我們在这里沒有适当地宣传他們那些表示支持的話。然而，在不斷出現的、說我們跟着一个外国共产党的“指揮棒轉”的謠言面前，这种表示就变得沒有意义了，因为它帮助了我党的敌人，是从背后刺了我們一刀。因为，这样的誣蔑，除了意味着我們事实上是驯服地在这个国家执行苏共命令的“外国代理人”(而这恰恰就是麦卡伦法所說的)以外，还

能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领导人对我党的攻击还不止于此。社論說，“在美国共产党內和党外，都有不少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它对这些“美国的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寄以最大的希望。然而誰是这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呢？显然是那些反对我党在意识形态上的立場和政策而支持中共的立場和政策的人。而这种說法如果不是在鼓励党“内外”的致力于破坏和摧毁党的那些人，那又是什么呢？事实上，中国党支持和鼓励那些主要是由被开除出共产党的分子所領導的反党分裂集团去进行这类活动，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这样，中共除了故意曲解我們的立場、污蔑我們跟着苏联的指揮棒轉以外，还直接支持致力于破坏和瓦解党的反党分子。

我們在上面已经談到，中国领导人对禁止試驗條約的反对，使他們参加了奇怪的一伙。但是，决不只是他們对这一个特殊問題的立場产生了这样的結果。相反的，在一个又一个問題上，他們在开始时表示高度“革命”的态度，任意指責其他共产党犯“修正主义”和“背叛”，但是他們最后却采取了使他們同反动派站在一起的政策，这已经成了他們的特点了。

他們拒絕和平共处，情况就是这样。他們在古巴問題上采取有利于美国那些号召入侵的人的立場，情况就是这样。他們采取有助于加强最反动的极右分子的、集中攻击肯尼迪政府的政策，情况就是这样。他們散布帮助反动派破坏共产党的、“跟着指揮棒轉”的污蔑，情况就是这样。他們加紧攻击苏联并进行反苏活动——这在中国内部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情况也是这样。他們关于沙文主义、同帝国主义結盟和类似的罪行的无端指責，成了苏联所有敌人的磨盘上的粮食。总之，中国党最后实际上已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在今天世界上反对帝国主义、

爭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领导力量当作了仇敌。

又引起了这个問題：对此怎样解释呢？我們問中国领导人自己，他們怎样解释自己在每一个問題上都处于帮助和平、民族独立、社会主义、苏联的敌人的地位这个事实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問題。

中共的路线和策略越来越令人不安地同世界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和策略相似，而世界托洛茨基主义则正在革命字句的掩盖下，极端地支持帝国主义反动派。托洛茨基主义的另一特点是提出完全不现实的、听起来很激进的建議，作为反对当前实际可行的步骤的基础。中国领导为反对部分禁試條約而提出的立即完全禁止核武器的建議，也是令人不安地与这一点相似。难怪各地的托洛茨基分子都热烈地欢迎中国党的路线。的确，这应当使中国领导人停下来想想。

爭取实行和平共处政策

我們美国共产党始終把爭取和平的斗争当做是自己的首要任务。它始終把自己稳固地建立在和平共处政策的基础上。

霍尔在《唯一的抉擇：和平共处》中写道：“全世界包括我們自己在内的馬克思主义者认为，和平共处政策符合并且将促进阶级斗争、殖民主义的結束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实现。我們堅定地相信，这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根据这个时代的現實情况，任何别的政策都只能导致失敗和挫折”。

生活已经证明了這項政策的正确，禁試條約也同样证明了它的正确。我們確信生活将继续证明这一点，而且我們有理由引以自豪的是，這項政策是我們的政策，我們曾一直毫不动摇地为它的实现而斗争。

現在這項政策受到了中國共产党的挑战。中國党已通过它的行动使社会主义陣營和国际馬克思主运动陷于严重的分裂，并在世界反帝力量中制造了不團結。情况是严重的，确切地預料會出現什么样的結果是不可能的。但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的共同願望終将占上风，團結終将恢复。

我們一向欽佩和称赞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岁月里所获得的光輝成就。我們一向敬佩它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所表現的智慧和策略上的巨大灵活性，认为这是所有的人都應該仿效的榜样。同时，我們一向深深地认识到我們自己有义务同美帝国主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每一次攻击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我們一貫要求美帝国主义撤出台湾，并为联合国接納人民中国而斗争。我們在任何时候都将继续这样做。我們热誠地希望，中国领导人也将寻求对共同敌人进行統一斗争的道路。

在当前，形势要求坚定地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們党在意识形态上的立場。特別是，爭取和平共处的斗争必須以加倍的努力进行下去。在这一点上，决不能妥协，决不能动摇。这是走向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道略。

（譯自1963年10月号美国《政治月刊》）

永不熄灭的灯塔（节译）

亨利·温斯顿

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给人类带来了伟大的希望，并把争取和平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提到了更高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领导提出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指责，硬说苏联签署和批准莫斯科条约似乎是“背叛行为”。北京领袖们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因而也反对采取措施来改善国际局势和促进争取达成更为广泛的、无所不包的协议的斗争。中共领导人的这种政策直接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损害。这种政策只对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有好处。现在重新考虑自己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来挽回那些不愿在热核战争的战火中死去的各国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还不算迟。

今天在北京，他们企图代表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有色”人种来说话。但是所谓的“有色”人种懂得，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散发着种族主义气味的态度，是用来蒙骗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居民的最纯粹的蛊惑行为。它违反要求所有被压迫民族——白种人和“有色人种”团结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

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和它所奉行的巩固和平的政策进行的诽谤性攻击，是欺骗不了各大洲的“有色”人种的。无论亚洲人，或是非洲人、拉丁美洲人都不止一次地亲眼看到正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条件下他们才有最有利的条件来突破帝国

主义阵线和摆脱贫民主义压迫。他們不止一次地亲眼看到，正是苏联才是被压迫民族最好的朋友。

（譯自1963年11月5日苏联《真理报》）

1960年兩次會議的回憶

伊丽莎白·葛萊·弗林

我在《工人报》上写过許多专栏文章，描述我在1960年和1961年两次訪問欧洲的情况，但是我在那些文章里沒有談到过这篇回忆所要記述的这些事情。参加1960年八十一一个党的會議的所有共产党本来都希望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之間的分歧能够只限于在有关各方之間进行討論，而不致变成一个国际爭論的題目，从而可能在許多党的内部引起混乱甚至分裂，并且肯定会成为被全世界資本主义报刊歪曲、夸大和利用的材料源泉。

但是，今天，既然中国共产党人把同志关系之間所需要的审慎抛到九霄云外并对包括美国共产党在内的所有不同意他們意見的党进行公开的攻击，而且在这样做时事先絲毫也沒有通知这些党，那末我就有責任使我的同志們了解我所知道的关于这些分歧在初期阶段时的情况和当时为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解决这些分歧而作的种种努力。

这些只是我个人的回忆。由于时光的流逝，这些回忆可能并不完全；但我认为沒有遗漏什么主要的东西。我提出这些材料是因为我相信它們也許能說明这場引起我們大家深切关怀的十分严重而且重要的爭論的真相。这場爭論已经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其他民主运动中造成了分裂，而且今天正在形成可能威胁世界和平的不容忽視的規模。

一、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 举行的五十个党的會議

1960年4月，我前往丹麦哥本哈根参加国际妇女节五十周年紀念。从那里我又去苏联訪問。6月里，当我正在休养所渡假时，我接到一封电报，說羅馬尼亞大使想見見我。我感到惶惑而又高兴，就驅車前往莫斯科。大使告訴我說，我的党（美国共产党）已经指派我为参加下星期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羅馬尼亞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兄弟代表。那一天是星期三。我于星期六乘飞机启程。同机的有蒙古和北朝鮮的人数众多的代表团。我了解到有五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兄弟代表参加那次大会。我是来自美国的唯一代表，正如我的老朋友安妮·布勒夫人是来自加拿大的唯一代表一样。我們两个人就結成了同伴。

代表大会在一个与王宮相連的漂亮的嶄新礼堂里举行。各兄弟党的代表們聚集在一度是瑪丽王后的御座宝殿的一周屋子里。我們了解到蘊藏着丰富自然資源的这个小而美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許多事情。代表大会結束时，各兄弟党代表被邀請到隔壁一間大屋子里聚会。屋子里摆有长桌，每个座位前都有一个扩音器和指示代表們座位的国家名称。

这次會議的內容对我们來說并不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在羅馬尼亞党代表大会开会期間，一个俄文翻譯給我讀过苏联代表团的一份备忘录，备忘录就中国代表团最近在各种国际会议上所进行的活动提出了一系列意見。但是現在，当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一个接着一个地提出类似的指责时，这些活动的全部影响就清清楚楚地表現出来了。我还記得当这些指责变得越来越多时，坐在我对面的印度尼西亚代表直忧郁

地搖頭。

出席布加勒斯特會議的有下列十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的代表：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波兰统一工人党，罗马尼亚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统一社会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和朝鲜劳动党。出席会议的还有欧洲各国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的代表。我們开了两天会，当时建議采取的唯一行动就是简单地正式重申在以前的各次会议上已取得一致同意的国际政策。我后来听说，其他地方的许多同志，包括美国的同志们在内，由于不知道当时所遇到的困难而对这项声明的简短和含糊其词感到惊异。

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指责主要是针对他們最近在各种国际聚会和群众组织的会议上所采取的行动和策略——特别是在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和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会议上。据说中国人曾经批评了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所同意的外交政策立场，这种立场他們以前也是同意了的。他們并不限于向其他的共产党人提出他們的批评，而且还把这些批评带到有非共产党人士参加的群众会议上。出席布加勒斯特會議的中国人拒绝参加討論，声称他們只受权代表他們的党作为一个兄弟代表团参加一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而沒有受权同其他党讨论重大的国际政策問題。第一天他們拒绝接受和签署公报。我记得领导中共代表团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声称，他們不像出席会议的许多其他人那样是党的首脑，他們必須向他們的中央委员会报告，让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他这样說，仿佛我們都不需要这样作似的。

* * *

关于中国党的行为的辯論，集中于他們出版了两本书的問

題上——一本名叫《列寧主義萬歲》，是紀念列寧誕生九周年的；另一本是中国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关于国际政策的社論选輯。中国党由于用各种文字出版这两本书并在所有的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內，在不同兄弟党磋商或不讓他們得知和不经他們同意的情况下，就进行散发而受到了尖銳的批評。这是对共产党人之間的同志式关系的异乎寻常的破坏。这被认为是一种不友好的行动。社会主义國家特別感到憤怒的是，駐在他們国家里的中国大使館被利用为进行散发的中心。

这两本书表现了同“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一普遍承认的論断的尖銳分歧。他們不承认全面、彻底裁軍的可能性，不承认不同社会制度之間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并且表示不相信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进行談判会得到任何好处。这两本书是在不幸的巴黎最高級會議失敗以后不久出版的。他們的批評針对着赫魯曉夫公开宣布的政策。那是苏联官方的政策，并且得到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贊同，得到了一些中立国家和世界各地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贊同。

中国人当时爭論說，而且直到今天仍然继续爭論說，赫魯曉夫和他的支持者夸大了核战争的危险性及其破坏能力，目前这样组织起来的世界和平运动是以恐惧为基础的，并且正在解除人民的武装和吓唬人民。他們爭辯說，和平运动必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必須乐于为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为社会主义而战斗。

欧洲和南美洲担任工会領袖的共产党人从北京回到他們的本国以后，立即抱怨世界工会联合会會議上的混乱和迷失方向的情况，这种情况是中国人把上述論点强加給會議的結果。他們抱怨說，中国同志給出席那次大会的共产党人安排了宴会向他們进行反对他們自己的党的政策的宣传。据报道說，世界和

平理事会也同样地陷入混乱。中国人在那里爭辯說，应当把那些不承认阶级斗争的宗教界的和平主义者排除在外，而且在任何地方都应当只把那些願意反对帝国主义和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接納入和平組織。在青年組織中他們爭辯說，应当禁止“資本主义的”青年参加。同样的論点也在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执行委員会里引起了混乱。

各兄弟党指出，这些过去一直没有表示出来的不同看法，显然是由中国同志們突然暴露出来的，而且是完全违反中国人已经同意的1957年莫斯科宣言以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路线的。这时，他們正在事先沒有同兄弟党进行磋商的情况下散发文件，提出決議案，而且公开为一种相反的立場辯护。

每个出席这次會議的人都被要求就会議的題目发表意見。安妮·布勒和我由于都沒有代表团，也沒有方法向我們的党請示，我們两人就在一起商議并且决定表明我們两党关于和平問題的既定立場。我們就这样作了。我說，当我从在莫斯科的一位美国朋友那里得到这两本中国书的英文譯本时，我曾经为它的內容感到不安。我还接到了加利福尼亞一位党代表写来的信，他說这些书正在我們那里的同志当中引起很大的混乱。我說，如果把这里所报道的中国立場应用到我們国家的話，那就不会有什麼和平运动了。我指出，和平运动不是阶级运动；事实上，不幸的是，我們那些工会还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参加进去。美国的和平运动大致是由妇女、学生和宗教界人士組成的。他們拥护和平，反对核战争，贊成禁止一切核試驗，贊成禁止核彈，贊成裁軍。他們并不反对资本主义或贊成社会主义。

在我发言以后，中国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带着一个女翻譯人員走到我面前。她想要知道是誰把关于那两本书的情况告訴我

的。是不是俄国人？这使我感到惊讶，我回答说：“我在我的发言中说过了，我所知道的全部材料来自美国同志。”

第二天，中国代表团声称他们已经同他们的中央委员会进行过联系，并且被授权签署公报，但是附有保留，这些保留将由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在以后宣布。这就是1960年末、紧接着十月革命节之后在莫斯科举行的八十个党的会议的由来。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没有参加对中国的书籍及其散发和中国代表在群众组织中的行动所进行的普遍批评的唯一代表团。当时以及后来在我对其他国家进行访问的期间，已经可以看出，大家正在进行着积极的努力来限制这场争论，谨慎地传达这场争论，而且最初只在党的最高一级中传达，希望这样能在八十个党的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事情很清楚，在布加勒斯特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中国代表团甚至不愿意回答讨论中所提出的問題。于是，大家同意休会，并且同意以后在莫斯科重新开会。

二、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 八十个党的会议

我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访问了罗马尼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我在任何地方都只限于同那些曾经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议的人谈论同中国人的分歧问题。

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在夏末时出席了联合国大会。10月里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包括已经到达那里的二十五个党的代表的筹备秘书处，负责八十个党会议的准备工作。这一次的代表不是那些著名的最高领导人，但都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重要的书记。我在那里面代表美国共产党，作为参加布加勒

斯特會議的继续，尽管这一点在美国和莫斯科都沒有公开宣布过。

秘书处开了三个星期的会，每天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开会，中間有一段“吃茶点的休息时间”。會議期間由于晚上去看芭蕾舞而显得活跃了。开会的地点是克里姆林宮內漂亮的、白色的格魯吉亚厅。順着屋子的长向平行地摆着两张长桌，两端还各摆着几张小桌子，构成了一个椭圆形。俄国人坐在一边的中央，中国人坐在另一边的中央。因此他們是彼此面对面地坐着，在他們的两旁坐着数目相等的其他重要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我們挨近英国人和加拿大人坐着，这在語言上有很大方便，而且使人非常愉快。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事先准备了一个提交八十一一个党考慮和通过的声明草案。这个草案长一万字。最后确定的声明有两万字。看一看这些主要共产党如何在一起进行工作，真是一种令人惊叹不置的经验。每件必要的东西都是由俄国东道主供给的：漂亮的文具盒、紙张、鉛笔——甚至还有薩柯—樊塞蒂工厂制造的紅蓝鉛笔。讲话的翻譯工作是在一間四面是玻璃的小屋子里进行的，我們的座位上都装有耳机和扩音器，从耳机里面可以听到用不同的語言轉播的讲话。如果你想在討論中发言的話，你旁边还坐着一个翻譯。

會議由东道主的党任主席——由米·安·苏斯洛夫和鮑·波諾馬廖夫輪流担任。有一个小鎗用来維持會議的秩序。显然不存在什么維持秩序的規則，而且肯定也沒有像美国會議上的那种要求維持秩序的情况。會議沒有中断过。每个人的发言需要多长时间就用多长时间。彼此之間保持着高度的礼貌。仅仅有一次主席进行了干預，那是在一个年轻的中国翻譯人員向一个古巴代表揮舞拳头的时候。主席制止了他，并且提醒他說，他

的責任仅仅是翻譯，而不是作出不友好的姿勢。中国同志撤走了那个翻譯。

講話都是非常簡洁、明白的，表明发言人在日常的解释工作和向群众发表演說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显然，許多人在使用他們本国的語言时都是伟大的演說家。叙利亚的被判了死刑而处于流亡中的巴格达什同志就是这样一位演說家。他每天用阿拉伯語向中东各国广播。

有些仅仅被列在“和其他党”中的人，是非法地去到那里的。他們当中有一些是从很远的地方冒着巨大的危险去的，而且在回去时还将遇到同样的困难。他們住在单独的地方，有着严密的警卫。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住在他們的漂亮的大使館里。我們同拉丁美洲人、古巴人、英国人、加拿大人、以色列人、澳大利亚人和日本人住在一座漂亮的新的党的旅館內。

* * *

文件的討論进行得很緩慢——一字一字地、一句一句地、一段一段地进行。有时候一整天就花費在一段上。最后，或者是得到了大多数的同意（沒有进行过表决），或者是，如果在某部分上达不成協議的話，就决定把那一部分提交八十一一个党的全体会議。一旦措辞经过大家同意并为大家所接受，那就算确定了下来。文件里存在着重复的地方，而在通常的情况下它本来是会簡短一些的，但是大家同意以后不再进行修改，因为那又会引起长时间的討論。声明就那样被提交給八十一一个党的會議。

中国共产党在八十一一个党的會議上的主要发言人，和在秘书处里的一样，是他們的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彭真仍然是中国代表团的成員。邓小平和其他中国代表作过几次长篇的发言。从中国人的发言中显然可以看出，在战争与和平、个人迷信、某些国家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党的策略等

問題上，中國同志仍然抱有根本性的不同看法。

但是，中國共产党的代表在重新說明了他們在對外政策問題上的立場以後，集中全部火力攻擊秘書處最後提交給大會考慮的幾段話。比起戰爭與和平和社會主義建設等問題來，這幾段話是次要的。但是他們把這幾段話全都提升為主要的問題。他們激烈地反對關於個人迷信問題的嚴厲提法，堅持說這些提法不是僅僅針對著斯大林的，而且是更具體地針對著他們黨的主席毛澤東的。為了部分地滿足中國共产党代表們的要求，這一部分在最後的定稿中做了相當大的修改。他們認為關於國際運動內部的宗派主義的提法是針對他們的，非常激烈地反對這些提法，以至他們為這個問題而退出會議的可能性似乎已迫在眉睫。因此，在最後的定稿中，這些提法也大大地緩和了。

他們，而且特別是阿尔巴尼亚人，反對把南斯拉夫列為一個社会主义國家。但是從討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所有其他的歐洲社会主义國家都認為南斯拉夫不過是暫時“脫離了社会主义陣營”。顯然，各黨同南斯拉夫有著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但是社会主义國家却同它有著貿易、合作和交換代表團等友好的國家關係。赫魯曉夫從聯合國大會回來後立即直率地表明了他的態度：我們究竟希望南斯拉夫站在我們這一邊，還是反對我們？難道我們準備聽任南斯拉夫人民去受帝國主義的影響嗎？

來自鄰近中國的國家的許多小黨，顯然都對整個的辯論感到極大的不安。他們顯然既不願意同蘇聯不和，也不願意同中國不和。緬甸、馬來西亞、泰國、北朝鮮、印度尼西亞以及當時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都是如此。澳大利亞從那以後已經同大多數黨的意見一致了。日本人更加直率，但要求“暫時擱置起來，以後再討論”。他們不太喜歡把核彈描繪成“紙老虎”的說法。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胡志明主席也要求在世界上兩個最大的黨之間所進

行的討論中保持團結和耐心，并且強調他們所負的責任。他避免站在任何一邊。

印度共产党是明确地同大多数党站在一起的。由于已经爆发成战争的边界爭端，中国党和印度党之間的关系从一开始就非常紧张。印度党的書記阿約艾·高士同志在會議期間患了严重的心脏病，紧张和爭辯使得他不得不住医院。他在回到印度以后不久就去世了。他曾說，边界爭端已經給印度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損失，并說中国共产党的領導人甚至不願同印度共产党——一个兄弟党的代表談話。我記得赫魯晓夫同志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曾对中国同志們說，如果他們遭到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苏联将用它所拥有的一切来保卫他們。但是它不願被捲入一場同一个友好的中立国家进行的边界战争。苏联曾经給过中国土地，当中国要求这块土地的时候。苏联也給过伊朗土地，而不是为那块土地而战，而且尼赫魯是与伊朗的国王不同的。他說，請設想一下我們这些聚集在这里的人开始爭論我們的边界。到我們离开时，我們的头上就将是光禿禿的了。苏联有十五个共和国。請設想一下它們开始为边界而爭論。他补充說，“像現在这样，我們几乎不知道有边界存在。我們在跨过边界时根本不会注意到那里有边界！”

* * *

在临近11月7日时，秘书处暫時休会。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各党的首腦都回來了，他們都直接到莫斯科參加11月7日的庆典。他們是尼基塔·赫魯曉夫，波兰的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捷克斯洛伐克的安托寧·諾沃提尼，匈牙利的卡达尔·亞諾什，保加利亚的托多尔·日夫科夫，罗馬尼亚的格奧尔吉·乔治烏—德治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瓦爾特·烏布利希。还有其他党的首腦也聚集在那里等待參加即将举行的會議——西班牙共严

党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英国共产党的約翰·高兰，巴西的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法国的莫里斯·多列士，以色列的舍穆勒·米庫尼斯，加拿大的蒂姆·布克和其他許多人。我不知道所有的人的姓名，但那确是一次异乎寻常的聚会。雷基·隆哥同志領導意大利代表团，因为意大利的选举使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同志不能脱身；而印度尼西亚党的主席迪帕·努·艾地正在美国陪同苏加諾總統进行正式訪問，包括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次訪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担任中国代表团的正式团长。

在八十一一个党的會議开幕以前，举行了一个欢迎赫魯晓夫同志归来的宴会，所有参加秘书处工作的人都接到了邀请。赫魯晓夫同志精神愉快而且兴致勃勃。苏联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并排坐在一起，像在这类社交場合上的通常情况那样。我看到俄国人总是以一种十分正确和尊重的态度对待中国人。赫魯晓夫同志在这次宴会上开玩笑地说，秘书处工作得真好，把一万字增加到了两万字。他说，他还没有看到内容，但他希望写得很好。不过，有一件事使他感到不安。他已经听说这个文件上把苏联党說成是共产主义运动之“首”。这在若干年以前，仅仅有一、两个其他的党的时候也許是正确的。但是現在，在已经有了八十一一个甚至更多的党的时候，这就是不可能的了。一个党怎么能給八十一一个党作出决定呢？我們怎么能了解并解决你們所有的問題呢？我們单是解决自己的問題就已经够困难的了！他说，今天，各党應該自己給自己出主意。然后他开玩笑地——但是带有一种預言性的諷刺——問道：“你們要一个为首的干什么——为的是你們能够把这个首砍掉？”他建議正确的說法應該是“先鋒队”。

后来，在复会以后，苏联代表团根据这一建議提出去掉“为

首的”字样而代之以“先鋒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全都欣然同意，认为“先鋒隊”能够更确切得多地說明苏联党同其他党的关系。后来我在大厅里遇見赫魯曉夫同志，他停下来問我：“您是否認為改为先鋒隊要好一些？”最初在秘书处进行辯論时我曾经表示过对于“为首的”字样将在我国引起的反应感到担心，他必然已经听說了。我向他說明我认为改了要好一些，这将有利于我們反对麦卡伦法的斗争，在那場斗争中“为首的”字样会成为一个障碍。他显得真正了解我們的問題，热烈贊賞我們党的斗争。他在宴会上表明了这一点——他向中国党祝酒以后立即非常热情地向我們党祝酒。

在討論原来写进了文件的“为首的”字样时，苏联同志要求把它刪去。出乎每个人的意料之外，中国代表团却坚持“为首的”字样，而且頑固地要求把它保留下來。最后，一个俄国人以一种罕見的激憤語調等于是这样問道：“你們說我們不忠實于馬克思列寧主义。你們指責我們妥協、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然而你們却坚持我們‘为首’。这是为什么？”这真是一個謎。但是，尽管他們反对，“先鋒隊”的字样还是被接受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认为，这不仅有利于那些普遍被指責为“外国代理人”的資本主义国家里的共产党，而且还将強調所有党的独立和平等，并駁倒“卫星国”的說法。

中国代表团想把社会主义陣營的对外政策和國內政策的責任确定在苏联的身上，这一点从辯論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人們愈来愈怀疑将来可能发生一場爭奪权力的斗争，那时中国党将試圖如此彻底地訛毀苏联，以致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世界领导权中的“为首的”地位，并且开始反对苏联共产党。（我們現在在1963年看到了关于这一点的明显证据。）

* * *

在辯論的过程中彼此进行了直率的批評，許多我們已經听到的謠傳也得到了澄清。赫魯曉夫同志在會上說，俄國專家已經從中國撤回，因為他們在業務上的意見受到了嘲弄，而且中國人自信他們已經能夠自給自足了。有一次，由於中國人不顧俄國專家的警告，以過快的速度挪動一個山坡而喪失了幾十個人的生命。還有一次，蘇聯專家受到了粗暴的侮辱，因而要求把他們召回來。他們曾經出於對安全和工程的耐久性的考慮而提出警告，反對匆忙地趕工。但是中國人不理會他們的忠告。到舉行慶祝完工的儀式時，中國工程師都被授予一面象徵勇敢的紅旗，而俄國工程師則都被授予一面象徵怯懦的白旗。他說，蘇聯公民不能忍受這種待遇。他們被撤回了。

在某些地方，他們讓俄國專家呆在旅館里好幾個月而不加以利用。捷克斯洛伐克的安托寧·諾沃提尼憤怒地談到一批捷克工程師在一項中國工程中承擔任務時曾經遇到困難。他們要求見見他們政府的代表，但是那位代表被告訴說那是“禁止外國人進入的地區”，因而他沒有被准許去見他們。結果，捷克專家就被召回來了。敘利亞的代表說，他們的專家，一些從敘利亞逃亡出來而且由於能够為中國服務而感到非常高兴的人，已經由於受到不好的待遇而要求准許他們回莫斯科。

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說，如果中國人能够保證給予公平的和同志式的待遇，他們的專家都將樂于再回去。一個驚人的不合作的例子是，據報道，中國政府曾拒絕允許蘇聯政府建立一個聯合早發雷達警報站，這個警報站準備用來保衛中國的和蘇聯的太平洋的水域，以達到共同防禦的目的。俄國對中國的援助數字提出來了，這個數字是很感動人的。

據說，在蘇聯的帮助下，人民中國已經建成了用最新式的機器裝備起來的一百九十八個工業企業、工廠和其他項目。靠了

苏联的援助，像汽車、拖拉机和飞机等新的工业部門在中国建立起来了；苏联还給了中国二万一千多套科学技术資料，其中包括一千四百多张大企业的蓝图。中国在巩固国防和建設現代化的国防工业方面也得到了帮助。几千名中国专家和工人在苏联的高等教育机构和苏联的企业中受到了訓練。同时，苏联从中国得到了它所需要的貨物，这也是得到了承认的。

* * *

除了莫斯科声明的內容以外，在討論的过程中还有許多其他的問題也被提了出来。中国人的“东风一西风”的概念，即革命精神来自东方的概念，受到了批評。我記得古巴人就反对。他們問道，“我們是东方嗎？”

“百花”的概念受到了怀疑；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問題：“那些杂草怎么办？”“大跃进”也受到了批評，被认为不是一个馬克思主張的概念，而且即使在中国也是不真实的。中国式的公社也经过了討論。一个发言的人这样說，“如果你們认为那些公社对你們很合适，那是你們自己的事。但是不要試圖把它們推荐到我們这些农場組織比較先进的国家里来，它們不适合于我們的国家”。

应用于原子弹和氢弹的“紙老虎”一詞又被提了出来，正如中国领导人经常重提的下列說法一样：在一場原子战争中可能死掉三亿人，但是还有三亿人会活下来，建設一个新的社会主义世界。这种对待人类的一半的毫无心肝的态度震惊了与会的同志們。一位代表一个欧洲小国（我記得是比利时）的同志說，“半个核弹就会把我国从地面上抹掉；”我国的許多人、包括我們的許多同志在內，一直怀疑这种據說是毛澤东提出的說法是否真的提出来过。但是，这件事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实际上，他們对这种提法感到非常骄傲，因而中国代表团在八十一個党的会

議上把用各种文字打印出来的那篇演說的文本散发給我們所有的人閱讀。但是，尽管我們有些人提出反对，在莫斯科声明上，还是对他们的观点作了让步，写上了下面这句含糊其詞的話：“如果帝国主义狂人发动战争，世界人民将清除和埋葬資本主义。”

我怀疑这样的話在今天能为世界上各主要大党所接受，因为它低估了核战争的破坏力。今天，在1963年，苏联在答复中国最近的声明时采取了比过去强硬得多的立場。但是，正如讀者能够从这篇报道中作出的判断那样，在1960年曾作出很多的努力去撫慰中国的同志們（尽管沒有在原則上同他們妥协）并使他們留在社会主义陣營內。

尽管采取了这种同志式的和解态度，甚至在1960年，我們当中那些曾经仰慕过中国共产党人和他們过去与苏联的亲密关系的人，在当时听到他們对他們以前称之为“老大哥”的人使用那种刻薄的和非同志式的語言以后，就都感到震惊。但是，甚至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这样一件事实：他們不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那些发言划清界线，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領袖恩維爾·霍查对苏联和赫魯曉夫的猛烈攻击是那些发言的最高峰。除了其他的事情以外，他指責苏联“当阿尔巴尼亚人民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拒絕供給他們粮食。”他大声叫嚷道：“粮食喂了苏联的耗子！”这是唯一的一次引起听众大声的憤怒抗議的发言。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回答了阿尔巴尼亚人。她說，“你們的每一吋土地都浸透了紅軍战士的鮮血，他們把你們从法西斯分子的手里解放出来。沒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你們的小国就不能生存！”波兰的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代表社会主义国家作了回答。他严厉地說，“你們現在頌揚斯大林，但是如果他还活着的話，你們就不敢在这里发表这样的演說。”

赫魯曉夫談到，阿尔巴尼亚压制任何亲苏观点并处决了一个怀孕的妇女领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游击队中的一个著名的女英雄。霍查轻蔑地反駁道，“她沒有怀孕！”據說在他們最初的十四名中央委員中只有一个現在还活着。阿尔巴尼亚的政权据报道說是一个典型的权力集团，它用审判、行刑队和集中營对待那些具有亲苏观点的人。

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幅員狭窄、岩石重叠而多山的小国，面積一万零六百二十九方哩，人口一百五十万。它的西面隔亚得里亚海与意大利相望。希腊在它的南面，南斯拉夫在它的北面。由于它地滨地中海，在那里設立一个苏联的潛水艇基地，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防禦是很有价值的。阿尔巴尼亚对它所有的邻国都持极端好战的状态，特別是对南斯拉夫，就像中国人所持的态度一样。但是最近它却一直在同西方的資本家們打着交道。

霍查給听到他的发言的、我們当中的大多数人的印象是一个疯子。他在发言以后立即离开了，把他的代表团留在那里。他在出席联合国會議时也不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在一起，他单独地来去和发表演說。到八十一一个党的會議結束时，全而和无条件地支持中国人的只有阿尔巴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显然是在进行一場反对苏联的斗争，并且仇恨苏联的領導人，特別是赫魯曉夫同志。有几个拉丁美洲国家批評了中国人对他们国家的某些广播，这些广播对霍查和阿尔巴尼亚党濫加贊揚。

人們指出，阿尔巴尼亚人曾经同意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路线，而且霍查，作为他們的党的第一书记，也曾经在那两次会上这样說过。而这时，他們在沒有任何明显理由的情况下又不同意他們曾经同意了的东西：对个人迷信的譴責，对斯大林的評价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政策。在苏联

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曾经表示赞同对个人迷信的批评以及为消除其有害后果而采取的步骤，但是对霍查和谢胡来说，这显然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不能认真对待。

但是，阿尔巴尼亚和苏联的正式破裂，不是由于他们同中国党的一致，而是由于他们所采取的反苏立场和行动。苏联被迫撤除了它设在那里的海军基地，尽管阿尔巴尼亚说有几艘舰只是属于阿尔巴尼亚的并且非法扣留了这些舰只。这件事只是在最近才公开。与基地有关的苏联人员以及苏联专家所受到的粗暴无礼的待遇，使得他们被撤走了。苏联大使在阿尔巴尼亚政府拒绝接待他并且在事实上把他隔离起来的情况下被召回国。阿尔巴尼亚的学生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撤回去了，有一些学生则是被这些国家遣送回国的。由于关系恶化的结果，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没有被邀请参加在1961年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 * *

中国人同阿尔巴尼亚人一样，当时和现在都坚持说只有他们仍然忠实于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而所有其他人则已经改变了而且同帝国主义妥协了！（同样地，现在，在1963年，他们声称只有他们忠实于八十一一个党的声明！）同个别的中国同志讨论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我们曾这样试过。有一个曾经在美国呆过的中国同志，是负责同其他代表团进行联系的。在那样的讨论中他多次提到“革命的美国工人阶级”。我纠正他说：“他们是有战斗性的，但不是革命的。”我没能使他信服。

我怀疑中国共产党人是否了解我们所面临的那许多问题——那些问题是与他们的~~高枕无忧~~不同的，是否了解为对付这些问题所必需的复杂策略，尤其是是否了解反劳工法和麦卡伦

法所造成的困难。他們用“美帝国主义”一詞來概括我們国家里的一切事物。他們沒有充分地区分統治阶级和美国人民——工会运动、和平运动、黑人解放运动、宗教力量等等当中的各种不同的发展水平。像他們在对麦卡伦法提出的抗議中的說法那样，把肯尼迪說成同希特勒一样，这就表明他們对美国和美国国内阶级关系的誤解达到了怎样的深度。

在八十一一个党的會議开幕以前，我和另外一位同志曾应邀前往駐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館。我們得到一份很长的文件，其中列举了他們对苏联党的所有的批評。我說我在听到正式會議中的充分討論之前不想加以評論。但是我們却就那位代表对美国共产党的某些看法进行了討論。他說如果我們是一个小党，这无关紧要；因为我們像一个潛望鏡一样，在下面和我們周围都是群众。我們彼此注視着。我們怎样才能把我們的处境向他解釋清楚呢？我說：“如果我們真有群众在我們的周围，那就好了。”他又一次显露出怀疑的样子，仿佛我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么。他有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想法，那是我們所不能动摇的。我說我們希望我們能有一个像意大利党或法国党那样的党，但他对这一点表示轻蔑，坚持說“一个坚强的核心要更好一些”。

回顾一下过去，似乎中国共产党人以前曾经对我们的党表現出了更好的了解，在对待其他党的关系上也表現出了更大的灵活性。目前这种情况可以部分地——尽管不是全部地，用他們对自己被迫处于孤立所感到的深刻而又合理的憤怒来加以解释。訪問他們那里的人和外国記者很少，从美国去的一个也没有。他們被摈斥于联合国之外，而那个无聊的蒋介石的一个代表却坐在那里。他們被禁止同美国进行貿易，尽管可以同加拿大和英国进行貿易。美国舰队经常挑衅性地出現在他們的海岸以外，自然而然地影响了他們对美国的看法。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的結果，他們給我們提了一些不可能做到的意見，例如說我們應當把革命當作一個比和平更為首要的目標。他們認為民主或民主權利如果不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法取得的，也是不重要的。他們認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鬥爭，無論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在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對革命的一種損害。他們堅持說，犧牲自己在物質方面的改善以便援助那些不發達的革命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一種義務。他們不贊成社會主義國家援助中立國家和那些“不革命的”或者沒有宣布贊成社会主义的新獨立的國家。

他們不相信可以通過和平的途徑走向社会主义。他們的主要發言人在發言時曾經詰問其他的黨，問他們認為在哪些國家里和平走向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英國、意大利和幾個拉丁美洲國家的同志都作了肯定的回答。西班牙的同志們作了同樣的回答；當然，他們的回答是有條件的，即要推翻佛朗哥和重建西班牙共和國。一位拉丁美洲的發言人對中國同志們說，他們不再派學生去中國了，因為他們回國以後就準備到山里去打游击，而我們却需要他們到工會里去作統一戰線的工作，或作議會鬥爭的工作。他說，“甚至菲德爾也沒有給我們提過那樣的建議！”

莫斯科聲明宣稱，某些新獨立的殖民地國家的發展可能採取“獨立的民族民主”的道路或者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這一點並沒有得到中國代表們的贊同。他們的看法是“要么全部，要么全不”，這種看法拒絕考慮在一個時期內可能的政治和經濟發展的各種階段，這些階段最終是會導致社会主义的。他們堅持說，所有的國家都必須在資本主義的地獄之火中走一遍。

但是，對於他們的“東風”之類的許多在文件中沒有提到的論點所受到的批評，他們除了說那是詩意的說法而不是政治的說法之外，並沒有打算作出任何答復。

他們把火力集中于文件中那些秘书处未能解决而提到全体大会的問題，即对“个人迷信”和对“在国际运动中进行宗派斗争”的譴責。实际上，像在秘书处的會議上一样，他們再一次表示出，如果他們的反对意見不被接受，他們准备为这些問題而退出會議。显然，这表明了他們以后所要采取的方針，这种方針在1963年不仅导致了在各党之間而且在各党之内煽动公开的宗派斗争的作法（就像他們在1963年3月的《評美国共产党声明》里提到“在美国共产党内和党外有少数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那样。）

* * *

在八十一一个党的會議閉幕以后，這場国际辯論逐渐走向公开化，但最初是在一种特殊的伪装形式之下进行的。俄国人攻击阿尔巴尼亚是分歧的根源，但他們实际上是指中国。中国人斥責南斯拉夫，但他們实际上是指苏联。这种不指名的方式現在也被抛弃了，爭論完全变成公开，再也沒有什么顧忌了。

在八十一一个党的會議上有一件事使代表們感到震惊。当中国的主要发言人向我們发表长篇演說时，中国翻譯們接管了翻譯人員播音室，俄国人离开了那里。俄国人一直以极高的效率进行着这一复杂的工作。他們在使用各种語言时都是惊人地准确而熟练。当詹姆斯·E·杰克逊和我准备书而发言（我准备在秘书处會議上的发言，他准备在全体会議上的发言）时，俄国人就預先来向我們請教某些特殊的“美国”字眼的精确含义。我們认为中国人让播音室里的所有俄國人員撤出而由他們接管播音室是一种不必要的和无礼的举动。但是俄国人有礼貌地答应了，沒有加以任何評論。

在漫长的辯論当中揭露出了許多事实，这些事實我相信是我们这里的人所不知道的。据揭露，在1956年的匈牙利反革命

事件期間，一个中国代表团曾经来到莫斯科，試圖劝說苏联把它的武装部队撤出匈牙利。他們的理論似乎是“越坏越好”，让法西斯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通过侵略匈牙利把他們的面目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但是，已经应納吉政权的請求把紅軍部队撤到布达佩斯郊外的俄国人，对于随后在那里发生的对共产党人的野蛮屠杀感到了震惊。他們問：“我們的同志和匈牙利人民怎么办？”在中国代表团离开的那一天，俄国人机场上告訴他們說，重新组织起来的卡达尔政府已经要求苏軍重返布达佩斯，苏軍也已经在那同一天开始向布达佩斯前进。

卡达尔和哥穆尔卡都充滿激情地談到俄国人击退波兰和匈牙利的反革命勢力方面、在拯救生命和拯救社会主义方面所作的事情。哥穆尔卡对中国說，“我們了解我們国家里发生的事情。你們不了解。不要代表我們說話。我們同我們的俄国同志有着亲密的同志情誼。”我們从他們的坦率的討論中知道了在这两个国家里发生的种种問題和錯誤。

在会上，卡达尔回答了中国人在匈牙利問題上对苏联的批評。在他发言以前，我在走廊里看到了他，正在一张小桌上用鉛笔写提纲。他是一个曾经在霍尔蒂独裁时期、在納粹統治时期、后来又在拉科西政权时期坐过监狱的短小精悍的人，他十分激动地談到1956年以前匈牙利的共产党政权所犯的錯誤——这些錯誤在人民当中造成了不滿，并且使得国内外的法西斯特务能够更容易地发动一次反革命事件。他为他們的錯誤給世界各地所有的共产党带来的麻烦而深感遺憾。在那些錯誤当中，他列举了那种不顾匈牙利人民的民族尊嚴、民族感情和民族传统而把他們的国家俄国化的企图；对待农民的残酷无情，用武力夺取他們的土地；以及用野蛮的鎮压、处决和监禁对待那些不同意这些作法的党的領袖和团体。

在羅馬尼亞，安娜·波克采取了一条同拉科西所遵循的路线相类似的路线，因此她很快就被撤职了。这些在法西斯分子被击败以后取得权力的人，是同斯大林站在一起的。他們不相信他們自己国家里的曾经被流放、被敌人监禁、甚至曾经在地下游击活动中非常活跃的任何同胞。他們认为只有他們自己和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同胞才是可以信赖的人，才适于参加政府工作。

同卡达尔一样，羅馬尼亞的乔治烏一德治曾经在监狱里呆过十一年，而且甚至在紅軍还没有到达之前就已经逃出监狱去领导解放的力量。日夫科夫是保加利亚的一个游击队领袖。哥穆尔卡曾经由于反对斯大林对待波兰的高压手段而被撤职和监禁。1956年，他在赫魯曉夫的帮助下获释并且恢复了他在波兰的地位，刚好来得及阻止了那里的反革命事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脑烏布利希是一个从納粹統治下逃到苏联的难民，曾经同紅軍在一起。他在納粹部队被围的整个期间用德語向他們广播，把即将降临到他們头上的命运告訴他們。詹姆斯·E·杰克逊同志和我在斯大林格勒軍事博物館里看到了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战壕里进行广播的照片。

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模仿苏联或者是彼此互相模仿，那是錯誤的。他們的体貌、語言、习惯、衣着、文化、房屋和政党都不相同。他們像一个家庭里的成年成员們一样，他們的共同之处是社会主义社会。对一个成员的伤害，自然地引起全体成员的关怀。他們的共同利益就是相互負責。他們对粉碎了一个又一个小国的納粹闪电战的恐怖记忆犹新，而且他們今天又对一个拥有新納粹领袖的强大的西德心怀恐惧。我在捷克斯洛伐克听说，沿匈牙利边界一带的农民在匈牙利反革命事件期间都把自己武装起来“不让法西斯分子进来”。他們对反革命事件的性

质絲毫不存幻想。

* * *

我們在会上听到了有关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經濟和軍事合作机构的詳細討論，这些国家都是经济互助委員会的自願的成員。一个长期的合作計劃正在实行。这个計劃的目的是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立劳动分工并消灭发展水平上的差別，期望这样能取得一个有助于共同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共同的高水平。

当然，他們之間会有分歧，例如近来显然已经发生的同羅馬尼亞之間的分歧，这些分歧已经被我国的报刊夸大到可笑的程度。分歧牵涉到羅馬尼亞准备建立一个巨大的钢铁中心的計劃。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計劃——我在1960年去羅馬尼亞时就听说过这个計劃。但是分歧能够友好地加以解决，就像这次分歧的解决情况那样。

一条来自苏联的輸油管道把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多瑙河流经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参加了一項共同的計劃：在必要的地方加寬河身，清除浅滩和芦葦，在有利的地点建筑堤坝。从各种报道中可以看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向所有新独立的国家提供物质援助和专家。然而我們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从未听到过一句怨言，尽管这样做对于这些曾经遭受战争破坏因而发展受到严重阻碍的国家來說，肯定会影响他們自己国家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经济互助委員会的成員，它也沒有参加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防御而建立的华沙條約组织。这样做的理由沒有加以說明，中国同志們也沒有討論到这些問題，尽管这显然使得中国更加孤立了。

在兄弟党之間的这种坦率的討論中，我們美国同志們在听到下面的事情时肯定会感到兴趣。有一次，在討論斯大林的錯誤时，赫魯曉夫同志質問苏联是否曾经有必要同它的邻国芬兰

作战，并且质問从这場战争中得到了什么。芬兰和苏联現在是和平友好地共处着的邻居，从芬兰获得的土地也已经归还了它。

在旅館里还有过許多非正式的討論，但是許多問題仍然沒有得出答案。一个問題是中国同志們为什么对尼基塔·赫魯曉夫个人表現出那么大的仇恨。有些人感到，在斯大林死后，中国人曾经认为毛澤东将被看作是世界上馬克思主義的权威发言人，并且认为所有的党都会接受这一点。隨后在苏联发生的围绕着莫斯科反党集团的斗争，使得这种期望毫无疑问地更加强烈了。这个反党集团中的某些人，特別是莫洛托夫，同中国人的觀点很接近。

中国人显然沒有預料到赫魯曉夫会成为苏联共产党的被承认的领袖，他們对此也不欢迎。看来斯大林的个性——高傲、冷漠、不喜交际——似乎更使他們喜欢。那些使得俄国人民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的特点，以及由于赫魯曉夫同人民的紧密联系和他的坦率、不拘礼节、平易而造成的新的安全气氛，显然并不投合中国领导人的心意。某些特別为美国人民所欢迎的特点——赫魯曉夫的善于交际，他的通俗的语言，他所讲的笑話——都遭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否定。他們說他粗野而又庸俗。每当他在会上讲话时，他們那种冷酷的严肃神情就表明了他們对他的蔑視。

* * *

最后一天来到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接受了莫斯科声明。在中国党的领导人中地位仅次于毛的刘少奇，在整个會議期間仅仅讲了一次話——就是在會議結束时讲了几分钟。他說，他很高兴，團結胜利了。但是他对声明未加任何評論。我敢肯定，沒有一个在場的人抱有任何幻想，他們知道我們的中国同志又一次是有保留地接受的。但是，他們在會議将近結束时似乎采取了一种比較緩和的立場。他們沒有确切地說明他們这种立場，

不过据推断是这样的：我們同意普遍裁軍、共处和結束戰爭等等是可取的。这些都很适于作宣传的口号。但是我們怀疑这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是否能够实现。不过，我們并不反对同志們为实现这些目的而斗争，如果你們认为可能实现的話；而且我們也不会阻碍你們前进。

我确信所有的代表都感到漫长的討論已澄清了气氛，中国人和俄国人之間的进一步会談将解决許多細节問題。显然，这种信念是出自我們的希望和願望，以后的事件并沒有证实这一点。

許多問題提到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澤东为什么不像前些年那样前去同所有其他党的首脑一起参加这次重要的會議。最近，在今年夏天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重要的会談中，仍然是那两位代表——邓小平和彭真，被派去担任中国党的发言人。人們怀疑，当其他的党派出了他們的最高領導人——同时也是他們国家的政府首腦——时，中国党不派相应的领导人物去参加如此重大問題的討論，是否由于他們抱着一种轻視的态度。

为了庆祝會議的閉幕和声明的签字，苏联共产党为所有參加會議的党举行了一次宴会。彼此干了杯，大家摄了影，我們的东道主还极力想創造一种善意和友好的气氛。赫魯晓夫同志除了同其他党干杯以外，再一次特地单独地为美国共产党干了一杯，說它是一个正在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带英勇地为爭取进行工作的权利而斗争的党。随后，刘少奇和大約有五十个人的整个中国代表团就到列宁格勒和基輔去旅行，他們在那里受到了俄国人民群众充满友情的接待。那时，俄国人民还不知道在八十一一个党的會議上所表現出来的尖銳分歧。后来在第二年里发生的事态发展，必然也使他們感到极大的震惊，就像它使我們所有出席1960年會議的人們感到震惊一样。

（譯自1963年11月号美国《政治月刊》）

論历史上的左傾主義

理查德·洛林

1956年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作出的最重要的論斷，也許就是承认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一个“新时代”，就意味着在一般所熟知的背景中逐渐地、迟缓地和矛盾地进行着的变化和发展，已经突然迸发成为一次重大的质变，现在，日常事件所由发生的背景本身已经改变，从这种新的背景来看，日常事件也具有不同的意义。

进入一个新时代的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在人們之間，即在那些承认变化并且希望充分运用适合新背景的新策略的人們与那些缩小变化并且想要坚持旧策略的人們或者那些如此迷恋于策略本身以至于无论时代已经起了多大变化也不愿改变策略的人們之間帶來政策上的和策略上的分歧。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发生的一切运动都有一段分歧的历史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在革命运动中最为明显，因为革命运动給它本身規定的任务就是試圖使它的行动符合历史的发展，因此，对历史的进程及其真正的作用的錯誤理解，就会在革命运动中造成比在任何其他方面都更加严重的損害。

因此，修正主义和左傾主义的起源，并不像斯坦萊·穆爾^①在探討目前“大論戰”的根源时所說的那样是馬克思的理論的互相冲突的流派（那种分析方法与认为一切不同的思想全都来自

① 斯坦萊·穆爾：《三种策略：馬克思主义的背景》，每月評論出版社 1963 年版。

上帝的意旨的那种唯心主义的想法并无多大的区别)，而是来自时代和情况的变化，是不同地区的人民的不同经验。

* * *

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机中瓦解的前后，列宁分析了当时伯恩施坦和其他人认为资本主义将发展并自动地去适应结束战争和结束剥削的错误见解。但列宁也分析了左倾主义者的错误看法。

左倾主义是革命运动中最老的毛病之一。列宁把它叫做一种“幼稚病”是十分恰当的，因为它在革命或革命运动的早期里为害最烈，但它也是利用个人或人民的社会幼稚状态的一个思想流派。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左倾路线，在革命运动中有它的长期的历史渊源。

马克思本人在世的时候，同巴枯宁的斗争是一项比任何其他分歧招致了更大的混乱和挫折的分歧。巴枯宁宣称他比马克思更加革命。巴枯宁和他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是以工人阶级而是以农民为基础的；因此，他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以意大利、西班牙、俄国和拉丁美洲等当时最落后的农民国家为根据地，就是很自然的了。巴枯宁对于群众组织和群众行动缺乏信心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处于马克思称之为“乡村愚昧”状态下的与世隔绝的农民，对这两个人都毫无认识。结果，巴枯宁的行动采取了个人的“英雄的”恐怖行动的道路，以此来引起下层人民当中的自发的反应。

因此，来自不同的社会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是以数量的威力即群众的威力为基础的，无政府主义则忽视群众行动，夸大暴力的作用并将它浪漫主义地加以理想化。

今天，没有任何其他地方比蓬蓬勃勃的黑人运动更加广泛

地显示出了数量的威力，这种运动完全通过群众的行动和决心所具有的威力而走向高潮。在这样一种庄严的示威中，暴力或武力的问题完全是次要的。

正如阿普特克曾经指出过的那样，当马克思使用“暴力是革命的产婆”这句话时，他指的是在新的阶级已经取得政权以后由革命政府来使用暴力——仅仅是为了替重建工作扫清地基。但是，即使从马克思这句话的本身来看，也足以表明他赋予了暴力多么次要和偶然的地位，因为，不是曾经有过千百万次健康的分娩是在没有任何产婆照顾、没有别人帮助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进行的吗？而且，谁能夸大产婆所起的暂时的作用，拿它来同产生一个新生命的许许多多奇妙的成熟过程相比呢？

中国共产党为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的立场而进行的斗争，不是像它所宣称的那样是在重复列宁反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的斗争，而是在重复巴枯宁反对马克思的斗争。在巴枯宁制造了分裂以后，马克思即看出，已经无法从巴枯宁的左倾歪曲所造成的破坏中挽救第一国际了。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巴枯宁的一派由于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内部冲突而逐渐消灭了。

* * *

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中所遭到的少数几次挫折中的一次，就是他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同托洛茨基的左倾主义所进行的斗争。在1918年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问题上和1920年抵抗波兰进攻的问题上，托洛茨基的左倾浪漫主义都比列宁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占了上风——幸而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只占了几个星期的上风。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拒绝面对生活的现实而且以“既不要和平也不要战争”的口号来逃避现实，号召德国人民举行同情革命俄国的起

义。当那些不理智的德国将军們沒有被托洛茨基的动听的口号弄得张皇失措而且他們的军队又恢复了进攻时，列宁終於使得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他的关于簽訂和約的建議。

在同波兰的战争中，当紅軍出人意料地打退了波兰人的进攻时，托洛茨基坚持說，如果紅軍推进到华沙的大門口，波兰的工人就会起来反对他們本国的资产阶级，波兰的革命就会成功。中央委员会不顾列宁的极力反对而支持托洛茨基。紅軍推进到了华沙，波兰工人也的确起来了。但他們起来支持他們本国的资产阶级，认为这是保卫波兰，反抗他們过去的統治者俄国；并且击退了紅軍，使得紅軍丧失了在此以前划定的“寇松线”以东的相当大一部分領土。就这样，托洛茨基的革命浪漫主义把胜利变成了失败。

在国内政策上，托洛茨基的左傾主义同样地集中强调暴力和强制手段。在1921年关于工会的作用的大辯論中，托洛茨基要求用不让紅軍复員的办法来解决生产危机，即把大部分紅軍改編成劳动队，并把工会轉变成国家机关。列宁坚持紅軍必須复員并且准許农民出身的士兵回家，工会必須仍然是自愿的组织，生产問題必須通过他的新经济政策和群众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

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在列宁死后，是有其历史的必要性的，因为托洛茨基，特别是从他在一个仍然（1923年及以后）主要是农民国家的国家里所享有的广泛声誉来看，肯定已引起了一种波拿巴主义的真正危险。

拿破仑在开始他的事业时只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軍官。但在取得了几次胜利之后他就发现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拿人权宣言来换取军事荣誉是多么容易。而且还有一个根本的理由是，可以使人民相信他們是在把他們的革命带到欧洲的其他地方。拿

破壞对欧洲的征服无疑地推翻了許多封建主义的制度，但是所有这一切的結果却是建立了反对风靡欧洲几十年的一切革命的一个紧密的反动同盟。

托洛茨基坚持把“国际革命”当成主要任务，反对斯大林坚持和平建設社会主义的作法。这还不仅是使俄国革命多少带上了一些波拿巴式的色彩而已，而特別善于吸取历史教訓的布尔什維克則坚决拒絕带有这种色彩。布尔什維克的决定使得目前这个时代的出現成为可能；在这个时代，社会主义制度正在逐渐成为占据統治地位的制度。指出下面这一点决不是不公平的：目前的托洛茨基第四国际对中国人的立場所給予的热烈支持，是有其充分的邏輯基础的。

列寧特別尖銳地譴責托洛茨基“惯于使用革命的詞句”，他不止一次地把托洛茨基形容为“搬弄詞句的英雄”。因为特別危险的是“詞句”会招致“革命的”主观主义这个事实。馬克思——和在他以后的列寧——珍視革命的銳气、革命的勇敢和无畏。說巴黎公社是“冲天”的，正是馬克思；說人民必須“蔑視死亡”的，正是列寧。但是无论は馬克思还是列寧，都从来不把政策单纯建立在主观的感觉上，单纯建立在革命的勇气上。政策必須以客觀条件和科学現實为根据。这就是馬克思一生的全部意义。这就是列寧的成功的意义和基础。因此，在充分认识到所有革命者的“理所当然的焦急心情”的同时，他們还认识到，这种心情只有建立在这样一些人的耐心上才有它的社会价值，这些人知道，要完成革命的社会震动就必须等待那些成长中的历史力量趋于成熟；革命是人民的产物，不是革命者的产物。因此，馬克思在大英博物館图书馆里进行研究，列寧在流亡时从事组织和发展馬克思主义的工作，毛澤东和中国紅軍在延安等待了将近二十年、执行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并給了蒋介石无穷无尽

的机会来证明或暴露他自己，卡斯特罗只进行小規模的活动和在馬埃斯特腊山区等待时机——所有这些都变成了人們非常熟悉的象征，就像人們所熟悉的那些历时久远的年轻人进行街垒战的照片一样。

* * *

目前这个新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必須避免战争。在以前的时期里，这不是一个中心問題。而且在过去这也不是经常能够做到的。但是現在，在原子弹的时代，和平成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时代正在把維护人类生存的責任交給社会主义力量，正如赫魯曉夫在古巴危机期間用他的行动所表明的那样。而且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历史不会把任务摆在人类面前，除非已经存在着解决这些任务的可能性。今天，社会主义能夠在沒有战争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理論的和政治的任务可能比以往更加复杂了。但馬克思主义科学也发展了。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力量也同样地发展了。

(譯自1963年12月号美国《政治月刊》)

和平是首要的^①(节譯)

詹姆斯·杰克逊

同志們，任何人如果想要縮小一場热核戰爭对人类的可怕意义和后果的話，那是违反起碼的常识判断的。历史唯物主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与某种关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灾难性理論的新辩证法毫无共同之处。根据那样一种辩证法进行思索和推理，是对人类的全部人道主义传统的蔑视。理論应当是常识的伸延，而不应当违反常识。

現在，某些同志宣称，和平也許是可能的。他們願意承认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論点有某些好处。但是，他們紧接着就急忙地发表不切实际的說法，并且大談在一場热核战争以后幸存下来的整个那一部分(或者只剩下一个微粒?)世界中盛行的——据他們宣称——社会秩序的性质。他們似乎十分肯定，在热核战争后的世界里出現的将是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秩序。我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會的同志們曾经在《列寧主義万岁》一书里指責道：

“現代修正主义者被帝国主义核战争訛詐政策吓破了胆。他們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第105頁)

他們还曾经宣称：

“胜利的人民，他們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

① 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八十一一个党的會議上的发言的主要部分。

速的步伐，創造出比資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創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第22頁）

但是，从这种預言里能够得到什么安慰呢？

同志們，必須防止一場热核战争。如果那些提倡上述概念的同志們，对于及时地在各种能夠阻止一場战争的力量之間建立良好的关系——一种已经存在的关系——是那么悲觀的話，他們怎么会对这样一場战争的結果如此乐观呢？实际上，这样一场战争将使地面上如此广大的地区变成放射性沾染的废土，将使现代文明的结构遭到如此重大的破坏，而且将給幸存者的社会组织带来如此众多的問題，以致我們无法肯定那时的社会组织的性质。在一場世界范围的热核战争所造成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那样一种社会秩序，将是社会发展史上的一种畸形、一种变态。像热核战争这样的灾难，将使人类发展的历史节拍陷于一种质的停頓。它甚至也不是对于指明人类目标和客觀需要的共产主义的一种奇怪的描写。我认为，起草委員会應該严格注意，不要使《声明》中出現任何可能安慰这样一些人的詞句，这些人以相信“我們”必将获胜的名义縮小为防止热核战争爆发而进行的全面斗争的意义。

* * *

同志們，正如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美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也因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我国人民对中国有着一种长期的、传统的亲密感情，而且多年以来，在美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間存在着一种亲热的、友好的关系。我們从中国同志們所作的貢獻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們在反对教条主义和僵硬的、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方面的工作和著作对我们特別有益。

我們近几个月来所讀到的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材料和昨天的

關於他們中央委員會的意見的再次聲明，同我們過去從中國同志們那裡所聽到的關於辯證法的思想方法、關於理論和實踐的關係、關於原則上統一和行動上靈活的必要性、關於在國內和世界政治中的統一戰線策略有種多樣的形式和可能性等問題的全部說法都是矛盾的。我們是否可以問一下中國同志們：如果我們，舉例說，接受只有一條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即內戰的道路的論點，把它當作一種僵硬的指導原則，我們在美國的這些人將怎樣過下去呢？如果我們那樣做的話，中國難道不也會遭殃嗎？談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論點的攻擊時，讓我們記住這個簡單的真理：革命的純潔性不是用流血的多少，而是用被壓迫階級取代統治階級的權力的程度來衡量的。

還有一件事是關於拿老虎的形象來形容美國帝國主義的問題。我們在使用通俗的說法時也曾經拿野獸的形象來形容它，因為這是一個我國人民所熟悉的形象。但我們使用的方法與中國同志們的大不相同。例如，我們最近在致古巴人民社會黨的賀電中說：

“美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成性的干涉主義集團像一只老虎一樣在吼叫並向古巴張牙舞爪。它想把她變成它的犧牲品。

“美帝國主義是一只年老的虎，它看不見新的世界現實；但是，它還是危險的，非常危險。……隨著日益高漲的反帝運動浪潮的每個新浪潮的出現，帝國主義老虎可以為所欲為的地區變得越來越小了。但是，老虎仍然是老虎——它直到死都是一種危險的吃人野獸。即使當它越來越孤立時，它的本性仍然不變。”

無論如何不能把通俗的說法提高到理論的水平。我們不應當把寓言奉為經典，或者賦予它一種政治規律的權威性，就像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毛澤東同志的“紙老虎”說法的明顯作

法那样。

我必須告訴你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們，在我們的国家里，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敌人，最近一直在用从《列寧主義万岁》一书的文章中精选的珍聞來裝飾他們的宣传。当然，无论我們說什么他們也是要污蔑和攻击共产党人的，但是为什么要帮助他們，同时使我們的朋友当中产生混乱并且使他們脱离我們呢？当帝国主义在联合国里的发言人华茲沃斯試圖吓唬中立国家不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組織里的合法席位权利时，他大段大段地援引了《北京周报》刊載的文章。在这个問題上，許多同情中国合法权利的朋友們表現出了窘迫失措。但赫魯曉夫同志不是如此。他沒有对那个狡猾的敌人作任何让步，而是揭穿了他的詭辯并且給了他沉重的打击。他不仅作为一个政治家、而且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領導了爭取中国席位的斗争。記住并且珍視这种国际團結，我亲爱的兄弟們和同志們，因为这是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的精华。

敌人不仅曾经利用这些錯誤的著作和某些不正确的行动来使輿論产生偏見，而且敌人及其代理人还曾经企图利用它們在我党内部恢复一种派別活动和不團結的局面。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他們的希望是注定要落空的，因为我們曾经有过对付派別活动手法和小集团主义的痛苦的经验，我們不会容忍它們复活。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錯誤意見的客观根源就是它在二十二年的內战中累积起来的中国革命的片面经验。1960年11月3日《新华社新聞稿》轉发的《紅旗》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中說，毛澤东在他的一篇《論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并沒有議會可以利用，也沒有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

法权利。毛泽东同志写道，“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

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党领导人在若干有关当代的估计、战略和策略的问题上思想中光辉的一部分，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目前所犯的错误的客观基础。毛泽东同志暴露了中国革命经验的片面性，从而也就暴露了它的领导人物的经验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可能会影响理论上的概括。它是被当作一种思想提出来的。当然，应当由中国同志自己来确定他们的错误和错误意见的根源，并且加以改正。但是，全世界所有兄弟党都有责任帮助他们在还没有对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团结和世界和平与社会主义在整个世界获胜的前途造成严重损害之前改正自己的错误。

同志们，我们愿意表示我们的愿望：我们的会议将达成坚定的协议，一劳永逸地结束所有威胁到我们强大而光荣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消极现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在某些问题上已经走进了一座爱斯基摩人的皮帐篷，一条死胡同。你们呆在那里，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寂寞和危险。不要拘泥面子吧。回过头来并在那些可能使我们分离的基本问题上回到主要的道路上来。你们的同志们将会拥抱你们，走这条路比较容易一些。而且，这是必要的。

（译自1963年12月号美国《政治月刊》）

肯尼迪被暗杀， 人民为什么哀悼？（节譯）

《政治月刊》社論

不管暗杀肯尼迪總統的子弹是誰發射的，不管這一惊人的、愚蠢的罪行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变态心理，總統致死的真正原因对于所有願意了解情況的人們來說是清楚不过的了。企圖把暗杀罪名栽在“共产党人”头上的任何努力，都掩盖不了这次暗杀是南方的种族主义分子的暴行、恐怖和暗杀甚囂尘上的結果、也是极右分子的狂热主义的結果这一无可隱諱的事实；达拉斯已经成为美国狂热主义的罪恶渊薮之一。

这次暗杀事件的意义从种族主义分子和极右分子的毫不掩飾的欢欣鼓舞的表現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但是从美国广大人民群众所表現的深刻的震惊和哀悼上可以看得更清楚。全国各地对已故總統表示的感人的悼唁，无数人們衷心流露出来的深沉的悲痛，二十五万美国人从国会圆柱大厅中的他的棺木前走过——所有这一切无疑地都說明，肯尼迪總統已经在美国人民的内心里占有了一个位置，他們对于他的逝世感到激动。

事实上，人民的这种深沉的悲痛，乃是围绕暗杀而出現的种种事态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这是一种值得加以进一步研究的反应。因为它說明肯尼迪總統已经成为人民热望和平和民主的象征——美国人民对未来的希望的象征。因此我們就像那些不管可能对肯尼迪政府提出什么样的批评然而却拥有可靠的事根据的人們一样，完全而且毫无保留地把我們自己同这种反应

联系在一起了。

肯尼迪政府是替垄断资本說話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它在保障公民权利而采取行动上表現得迟緩、犹豫而且不够有力，它沒有在情况需要时运用联邦政府的力量于預南方，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取得体現在部分禁試條約上的爭取和平的重大成就的同时却在柏林問題上继续采取好战的态度，并且拒絕放棄对南越人民推行的毁灭政策。

批評的項目单可以愈拉愈长沒有止境。但是仅仅止于批評就会丢掉了主要的問題。因为最重要的是，肯尼迪政府、特别是肯尼迪總統本人，已经在人民的心目中逐渐代表着一种愈来愈朝着反对种族主义和反对推行战争的方向变化的趋势。

这并不总是这个政府的方針。相反地，在1962年10月的加勒比海危机以前，它似乎有向右轉的趋势。但是，肯尼迪在这次危机中作出的关于接受赫魯曉夫建議的决定，标志着一个朝着和平共处轉变的轉折点。这一轉折由于他的1963年6月10日在美利坚大学发表的演說以及最后簽訂了禁試條約而表現得特別明显。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总统的1963年6月11日的广播演說和继之而来的民权法案都标志着一个类似的轉变。在对肯尼迪政府进行任何实事求是的估价时都必須把这一点看成是决定性的因素，无论这个政府的政策中表現出了怎样的犹豫和矛盾。

* * *

与此形成尖銳对比的是，某些左派坚持这种看法，认为肯尼迪政府构成了反动的中心，或者說，至多不过和右派沒有两样。从国际上來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作出了最极端和最可耻的反应，他們完全沒有那种几乎是籠罩全世界的既震惊又悲痛的感觉，只是认为这次暗杀不过死掉了一个为首的帝国主义分子或法西斯分子而不加理睬，大概他們认为这是一个使他們感

到欢欣鼓舞的原因而外别无其他。但在不久以后，周恩来在他最近的旅行期间修正了这种看法。中国的反应在我国得到了进步劳工派极左狂热分子的附和。

(译自1964年1月号美国《政治月刊》)

談中国最近的声明

葛斯·霍尔

中国共产党最近以理論刊物《紅旗》杂志的社論的形式发表的声明是一篇需要詳細地研究和答复的声明。但是，其中有一点是需要立即加以回答的。

声明提出了一种政治的和哲学的理論，想以此证明分裂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是必要的、甚至是可取的事情。这种理論颂扬旨在分裂各国共产党的不负责任的、破坏性的政治活动，把分裂定为应努力争取实现的目标。

人們不可能对下面这些話有其他解釋：“第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还有：“团结，经过斗争甚至分裂，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辩证法。”

一种把分裂队伍說成是正当的做法的理論永远是不利于工人阶级的。这种理論不利于爭取世界和平的斗争，有害于反对帝国主义和爭取殖民地解放的斗争，有害于爭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把自然界事件通过分裂而发展成长的过程拿来作为分裂工人阶级运动的論点，是一种机械主义的、甚至宿命論的态度，它沒有考虑到最重要的因素：人的有意识的因素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響。

現在工人階級队伍內的確在進行着一場鬥爭。這是一場反對以分化工人和使工人互相傾軋為目的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鬥爭。對這種勢力進行鬥爭的辦法就是為爭取工人階級的團結而鬥爭，為反對共同的敵人而共同奮鬥。這場鬥爭是不可能通過故意分裂工人階級來進行的。這種分裂的理論不是新的，也不是首創的。它許多代以來一直是各式各樣反共的分裂集團倉庫里的貨色，始終是用來掩飾破壊性活動的。

指出這一點是重要的：這種促進分裂的做法被辯解為對一條以“‘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為內容的路線”進行鬥爭的必要手段。這就是說，這是針對試圖在爭取世界和平的鬥爭中建立最廣泛的團結的人的。

中國黨的社論所提出的理論是失敗主義的主張——它對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缺乏信心。他們在談到蘇共時說“他們把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陣營搞得亂糟糟”，這句話不可能有別的意思。因為事實正好相反。今天世界明顯的特徵並不是存在着這種“亂糟糟”的局面，而是社會主義部分、已經解放的和殖民地的人民以及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工人階級力量日益強大，他們現在正在世界關係中發揮著具有支配作用的影響。

只有認識這個主要的事實，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才能對打敗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抱有信心。“亂糟糟”的是資本主義陣營，只有它才從任何分裂世界工人階級的政策中真正得到好处。

（譯自1964年2月16日美國《工人報》）

共产党人的目标 必須是全世界工人的團結

——馬克思主義的團結有利于和平和社会主义

美国共产党声明

我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不仅是把自己、黑人和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所有被剥夺的阶层从垄断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为广大群众创造富裕的新生活，而且它还担负着保卫一切有价值的民族遗产和一切创造文明的责任。

我国工人阶级的命运是要把国家引导到国际友谊和为人类服务的新的高度。只有在维护全人类免受一场由于爆发热核战争造成巨大灾难的基础上，它才能完成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责任，也才能得到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的正当的地位。

维护和平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世界工人的第一个光荣任务。这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同珍视人类的生命和成就的全体人民一起承担的一项任务。

美国共产党了解我们的党、我们的阶级和全世界工人在这个时代里对历史担负的严重责任，在这个时代里，正在上升的社会主义照亮着通往消除经济和文化匮乏和消除对暴政的担心的道路，但同时热核的和火箭的战争工具已经达到有使全世界毁灭的破坏力量的程度。

正是根据对我们的阶级和我们的国家的责任和遵照全世界人类的利益，我们才重申我们批评和拒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有关争取和平、民主、经济发展、民族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

政策的一系列的問題上所主张和奉行的方針。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企图越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散布他們的观点，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和混乱的局势。

采取符合于原則的一切必要措施来尽快地恢复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队伍的团结，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义务。

因此，我們认为应在适当准备后尽早召集一次全世界各国馬克思主义政党的會議，以便就有人在有关普遍原則的問題上脱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路线的問題得出一致意見，并且为了促成必要的自我改正錯誤和加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团结和这个运动的各国党的兄弟友誼，提出必要的建議。

(譯自1964年4月19日美國《工人报》)

对七百名大学师生讲话中 有关中国党的部分

詹姆斯·杰克逊

中国人低估热核战争的危险，不加批判地接受对于斯大林的迷信，嘲笑对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依靠民族主义而不依靠馬克思列宁主义，歪曲反帝斗争，他們的宣传具有反苏性质，他們干涉其他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

（译自1964年4月19日美国《工人报》）

两个支流——一条河水

葛斯·霍尔

任何想在不发达国家与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間打入一个楔子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多年来，帝国主义一直想做到这一点，但都是白费力气。他们使用了威胁的手段。他们企图用收买的办法来打开一个缺口，但都是白费力气。杜勒斯到死还在企图这样作。十年前，任何中立国家或中立的领袖都被谴责为美国的敌人。这是企图强行制造这样一个分裂。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某些领导人为了他们自己的狭隘的派别主义的目的而奉行企图制造这种分裂的政策，就是格外令人惊骇的。但这种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他们企图分裂使目前的世界力量对比成为可能的那些力量。这一企图就是要分裂曾经使得世界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和平、进步和社会主义一方的那种力量。

今天谁能否认，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首先是苏联的存在，才使得数十个国家和民族在短短的时期内取得独立和自由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跃进成为可能呢？各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富有战斗性的斗争的高涨，是取得胜利的基本因素。但是，是强大的社会主义保护伞使得这些斗争有可能取得令人注目的突破。这两股潮流现在已成为一切进步运动的主力。事实上，文明的未来就落在它的肩上。

“不发达”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大公司用来形容那些被掠夺、

糟踏和蹂躪的国家的一个漂亮的形容詞。这些国家在取得独立以后，被弄得一无所有、掠夺一光、到处被烧毁。在北越，法帝国主义者在离开时甚至連矿井里的机器也一起拿走了。

因此，这些国家在开始搞的时候就需要机器、粮食和技术。帝国主义一直願意予以“帮助”，但是只是在他們能够重新建立他們奴隶主的統治地位的情况下才願意这样作。

現在的一个新情况是，在現在这个时代，新独立国家有了一个地方可去，在那里他們可以不必以自己的独立、自由或資源的任何部分作为交易，而得到援助、貸款和技术。埃及需要一个水坝。美帝国主义者說：什么也不給。在这关键的时刻，苏联援助了这个不发达国家。

因此，重要的問題是——那种企图使这些新独立国家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分离的政策的实际意义究竟是什么？

許多世代以来自己就是帝国主义奴役的受害者的中国，并未能够，或者沒有能力提供这种援助。事实上，中国社会主义建設的最初十年中所建立的工业企业，絕大部分是来自苏联的。

如果上述分裂政策得逞，那么，留給这些新国家的唯一出路是什么呢？它們將不得不开始从軟弱的地位出发来同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它們同社会主义世界結成联盟，就不仅可以从社会主义国家得到援助，而且可以从实力地位出发来同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

这样一个分裂如果得逞的話，其唯一結果是把新独立国家赶回帝国主义的魔掌中去。这个时代进步的規律是：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体系——同那些从帝国主义牢獄中摆脫出来的各个国家和人民之間的联系愈紧密，消灭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魔鬼的日子也会愈早到来。这种联系愈紧密，保卫世界和平的可能性也愈大。这种联系愈紧密，文明也会更加

迅速地达到新的更高的目标。

这种团结对于在美国的斗争具有一个根本的教训。我国今后的一切进步都有赖于工人阶级和黑人的团结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以争取结束一切形式的歧视的斗争为基础，来建立这种团结，就是为战胜一切形式和一切表现的垄断资本主义建立基础。

（译自1964年5月17日美国《工人报》）

未来的意识形态

葛斯·霍尔

使千百万人行动起来、激动人們的心灵、发动和引导群众运动的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单一因素是，日益迅速地认识到我們在文明史上第一次达到了这样的阶段，就是能够过沒有貧困也不担心貧困的生活。他們认识到科学和技术的水平不仅能够成为消除貧困的基础，而且还可能成为消灭战争、压迫、各民族和各国人民之間的敵視和不平等的这种社会的基础。

在一批又一批为爭取實現他們現在认为已经具有現實可能的事业而斗争的亿万战士队伍中，这一认识就像太阳电池一样，供給能量和战斗精神，激发他們的政治力量。

随着这种认识的提高，日益广大的群众到工人阶级这里来寻求领导；由于历史的必然性，工人阶级是社会上唯一注定要在斗争中领导文明进入現在所期望达到的高峰的阶级。

工人阶级正确地把它的阶级产生的根源和它斗争的光輝篇章都追溯到资本主义作为人与人之間的经济关系的体系出現的那个时刻起。它的阶级觉悟、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特点的发展，都是在残酷的、毫无人性的剥削和压迫这种充满鮮血和眼泪的条件下形成的。它在斗争的这种严酷考验中准备去完成历史賦予它的使命。

工人阶级在数量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意识上的提高，这是当代历史的中心因素。工人阶级越来越满怀信心地踏着坚定的步伐，光荣地执行着自己的任务。这一阶级从一些分散的、

沒有團結、沒有見解的集團變成了一支世界性的力量，現在這一力量日益決定着人類事務發展的方向。目前，工人階級是爭取世界進步的最具有決定性的力量。早在一個多世紀以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寫道：“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才是真正革命的階級。”今天，這些話比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還具有更為現實的意義。

在工人運動中，有不少的事件是它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標誌着這些政治里程碑之一的第一國際一百周年紀念。這個事件標誌着工人運動一次質的飛躍，因為在一百年以前，工人階級思想意識的提高過程、它的階級覺悟的發展、組織和鬥爭經驗的積累，都達到了這樣的高點，使有可能成立工人階級第一個國際的政治聯合——第一國際。

在質的方面，這確實是向前邁出了巨大的一步。這是工人階級日益理解到它隨着歷史的發展所應起的作用而產生的結果。這是同它逐漸覺悟到它要領導鬥爭以便從沾滿鮮血的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政權的任務這一點是一致的。它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工人運動當時正在制定新社會制度的藍圖。社會主義思想當時開始扎下深根。這些思想以及資本主義的慘无人道，使得在所有工業化的國家里當時都產生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團體和組織。第一國際就是這些組織的產兒，是工人階級先進階層中正在醞釀的希望和思想的產物。

工人階級的第一個國際組織僅僅存在了十年左右，但它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成就。恩格斯在談到馬克思的作用的時候說過：“這確實是創造者——即使再沒有創造過什麼別的東西——可能引以自豪的事情”。第一國際把力量動員起來了，這些力量正在履行它的諾言。它提出了在當前整個歷史時代中將為工人階級服務的一套指導原則。在它建立之前所積累起來的經

驗，都包括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之中。积极参加第一国际的領導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学，制定了从那以后成为工人阶级指南的战略和策略原則。

馬克思和恩格斯吸取了人类智慧所創造的最优秀的一切，加上了自己的天才，然后又研究了社会、科学、哲学、经济、历史、政治現象的各个方面。由于他們畢生的研究和斗争，他們为工人阶级确立了科学、理論和世界观。这使工人阶级不仅意识到自己的作用，而且还理解到它周围的社会。这使它看清了前景，为它指出了它應該遵循的方向。这就把自发的工人阶级精神和思想意识傾向包括在一門社会科学当中，并成为它的一个必然部分。第一国际成了检验这种新的思想理論派別——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实验場所。

在第一国际决定停止自己的组织存在以后，恩格斯对它的活动作了如下的总结：“十年来，国际支配了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即蘊藏有未来的一方面，它可以自豪地回顾自己的工作。”

国际是当时正在走上生活的中心舞台的那个阶级的产物。恩格斯相信第一国际是站在“蘊藏有未来的歷史的那一方面”的，这不是抽象的推論。他的信心是以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規律的理解，他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性质所进行的科学和客观的分析为依据的。正是这一点使他相信产生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的第一国际的那个阶级，相信工人阶级。

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斗争

为第一国际所进行的斗争，从真实的意义來說，是爭取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得到发展和占优势的历史性的斗争。对这种世界观的挑战是激烈的和多方面的。对于这些阶级概念

的挑战在欧洲大陆和英国的中等阶级中是根深蒂固的。这些攻击来自右面，也来自左面，但是，两者都是从共同的非工人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方面产生的。来自右面的攻击，目的在于阉割第一国际的革命内容，将它变成一个互利会。来自左边的攻击则是以参加第一国际的大多数党内部那些玩弄左倾词藻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主义阴谋的形式进行的。

这些非无产阶级的倾向吸引并鼓励了各种类型的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他们玩弄革命运动，把它当作儿戏。关于这些小资产阶级宗派及其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恩格斯写道：“这种儿童启蒙读本在工人运动的现实条件还不大发展的……曾经受到欢迎，……在一些爱好虚荣的、沽名钓誉的空论家中间也受到欢迎。”

第一国际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右倾和反对左倾——同今天一样，在本质上是争取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发展和占优势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方面的关怀表现在他们对第一国际通过的共同章程所作的以下修改中：

“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人，都可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但是，为了保证协会的无产阶级性质，每一个支部在自己的成员中必须拥有至少三分之二的雇佣工人。”

在第一国际的各个支部中经马克思和恩格斯辉煌地发展和捍卫的、反映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取得了胜利。尽管第一国际存在的时间很短，但是正是这一胜利使它在工人运动史上占有非常的光荣地位。

但是，这仅仅是一系列斗争的开始。虽然在一个重要的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但是阶级意识形态斗争这场战争并没有结束。在意识形态方面应该在一个又一个的战役中取得胜利。斗争是永无止境的、经常的，不能歇气，不能有休假日。你一放松警惕，

你就馬上失敗了。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我們的任务就是要根絕資產階級的意识形态，而代之以工人階級的意识形态。

从第一国际的时期起，对馬克思主义的攻击是在各种不同的借口下进行的，但其基本內容总是一样。攻击的主题是各式各样的，但是都包含一个中心的特点。就是攻击和否认馬克思主义的阶级特点。它們都反对工人阶级和它的意识形态、它的概念和它的历史作用。所有这一切都是企图将馬克思主义同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分开。只要能将馬克思主义同它的自然基础分开，就可以努力把它或者变成一堆圣经式的教条，或者变成一堆道貌岸然的哲学思想，在客厅中可以作为抽象討論的絕妙題材。

为了潜移默化地在群众的头脑中培养和灌輸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资本主义的辩护上就必须竭力使工人阶级对于本身明显的历史作用的概念模糊起来。所以，不管他們的攻击怎样千变万化，其中总是包含要贬低，甚至是消除作为爭取进步斗争中的一个因素的工人阶级的这种企图。攻击可能是垄断资本发言人的正面攻击，或者是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影响的人的攻击，也可能是那些用“左”的詞句甚至社会主义的詞句掩盖起来的人們的攻击，但他們的目的始終是要贬低或者消除工人阶级，抹煞资本主义的基本阶级本性。

在美国，关于这个題目的最新說法是这样的：自动化代替了工人。接办工人职务的是“白領”雇員，所以工人阶级正在逐渐消失中。他們問道：怎么可以談論一个实际上正在消失的阶级的领导作用呢？因此，得出的直接的結論是：現在正在成为社会的先进阶层的是白領的技术人員和专业人員。很明显，如果认为工人阶级离开了舞台，那么，各种小资产阶级的非无产阶级概念和思想就可以长驅直入，为所欲为。

还有这样一些不同的說法：由于某一国家的特殊历史条件，

这一国家的农民和中产阶级分子同世界其它地区的农民和中产阶级分子以往和现在都有所“区别”；所以，他们说，最进步的就是这些分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企图用这种说法来解释他们的错误观点，即认为农民将通过公社领导着走向共产主义的大跃进。

还有一种说法是：世界其它地区的工人阶级可能的确是革命的，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却不是这样的。他们还说，由于某些“特殊的”历史发展条件，这个工人阶级已经彻底“腐化变质”，因而不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甚至“不要把工人阶级偶像化”的陈词滥调，也变成了贬低工人阶级作用的护身符。把工人阶级偶像化是一回事，而贬低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则是另一回事。认识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的性质是一回事，而利用这一事实来把工人阶级从进步人类的范围内排挤出去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实际上，这些不同说法的必然结果是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性质，只要否认作为资本主义产物的工人阶级的性质和作用，那就一定会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分为两个主要的敌对阶级的基本原理。

“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即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就是这样。正是资本主义的这一阶级本性决定了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即上述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那样否认一个中心矛盾的存在，就意味着否认资本主义基本的阶级本性。

所有的发展，其中也包括所有其它的矛盾，都是在资本主义这一普遍的基本阶级本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心矛盾之内产生

的，并且同它是有联系的。否认资本主义这一基本本性，也就是贬低工人阶级的作用，而把非无产阶级分子提高到占优势的地位。关于各种时而上升、时而下降的矛盾无止境地混合在一起的理论，就是无休止地混淆阶级的理论，以此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主要阶级形成我们时代的中心矛盾这一概念。

一旦否认了资本主义的基本本性，那末，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不是中心的矛盾，而仅仅是毫无规律和理由地时而上升时而下降的许多矛盾中的一个。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的根本错误的看法。

只有把愿望当作现实，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人，才能得出这些错误的结论。

在第一国际存在的那些年代里，以巴枯宁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派别主义者，用听起来很激进的左倾词句来掩饰自己的攻击和对工人阶级的缺乏信心。从那时以来，这种论调一直存在，虽然说法上有所变化。我觉得，这也是由这种小资产阶级情绪产生的：你既然已经不相信自己能够领导或者影响工人了，那末，为什么不退到客厅中去，在那里对工人阶级的“落后”大发牢骚，并且互相竞赛，看看谁讲得最惊人，最“革命”呢？如果你讲得确实惊人，那末甚至资产阶级报纸也能腾出篇幅，利用这些词句来宣传，说明工人阶级政党是多么疯狂和不负责任。

当然，如果这仅仅是在客厅里进行，那还没有什么害处。但是把这些话拿去劝告那些没有长期经验因而认真接受的人，那就是一个严重的問題。而一旦拿这样的劝告来指导工人阶级组织的斗争，结果就会适得其反，变成敌人的工具，成为资本家能够用来把领导同群众基础分离的手段。历史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就是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由于自己不负责任的行动和意见而被敌人利用了；正像也有无数的例证说明右派修正主

主义者削弱工人阶级组织的积极性战斗力也导致了挫折和失败一样。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概念，是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关键性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是从各国劳动人民共同的自我利益产生的。它反映着一个不受狭隘的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民族主义腐蚀和歪曲的那个阶级的深刻的天然愿望。它体现了人在没有战争和阶级、没有种族狂热和民族对抗的世界中的意识形态的基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一个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中是主要的支柱。

就是这一切，但还不仅是这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阶级斗争中的重要武器。它是工人阶级团结的最高表现。事实上，它是检查人的阶级觉悟和社会觉悟的严格考验。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写道：“但是首先必须维护排除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并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的真正国际主义精神。”

“首先必须维护……真正国际主义精神……”。国际马克思主义运动今天有一个决定性的迫切需要，就是对这些话的全部涵义应该再度作一番深刻、仔细而彻底的新了解。

这种真正国际主义精神的确成了勇敢的战士。它并没有取得一切战役的胜利，但是它具有一个辉煌的记录。从第一国际的时期开始，它就逐渐成熟，变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胜利地抵抗着从资本主义的湿地和臭沟中流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倾向的进攻。

在第一国际的活动中以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反映的这种“真正精神”，在美国历史的过程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痕迹。

馬克思在論及美國南北戰爭時談到了這種表現：“自从巨大搏斗在美国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們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連在一起的。”“使西歐避免了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廣奴隸制進行可耻的十字軍征討冒險的，并不是統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國工人阶级对于他們那种罪惡的瘋狂行為所進行的英勇反抗。”“美國永远不應忘記：从这次冲突的开始直到終了，至少英國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背弃过它。”

美國的工人阶级將永远感激這些真正国际主义精神的表現。如果当时欧洲的主要大国都用自己武器的全部力量来支持奴隶主，那末我国的历史将按照怎样的方向发展，現在就只能揣想了。

在第一国际栽种和培植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棵幼树的時候，工人阶级的土壤已经准备得很肥沃了。

历史的篇幅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影响和成长的证人。列寧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号召支持工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他的号召在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中間得到了响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真正国际主义精神”寫下了英雄般的篇章。具有战斗性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如列寧、李卜克內西和卢森堡这样世界著名的領袖，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人，胜利地进行了斗争，反对将世界工人阶级推入与这次帝国主义战争同时发生的种族歧視主义、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深渊的企图。有过庄重伟大的运动，使許多国家的工人参加了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也有許多例证說明帝国主义国家內的工人表示了他們支持殖民地各國人民爭取独立的斗争。无数次爭取和平的行动，數以千計的声援罢工运动，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的运动，要求释放政治犯的行动，所有这一切都无可辯駁地证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树根是多么深，多

么壮。

苏联工人阶级和人民掌握政权以后，又确立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新准则。他们对其他新参加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的无私援助，以及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对新独立国家的援助，都将永远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纪念碑。社会主义各国准备保卫刚刚从帝国主义监狱中出来的年轻国家，甚至准备保卫还没有作出它们将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这一基本决定的那些国家，为各民族和各国人民之间贯彻新的关系准则打开了大门。

但“真正国际主义精神”过去和现在都不是没有暂时的挫折而一直向前发展的。对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棵树来说，并不总是既有阳光又有时雨的。狭隘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就像风暴一样在它高高的树枝周围怒号着。种族主义、侵略主义和沙文主义又像蛆虫一样要蛀蚀它的树皮。

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它在争取自我利益的斗争中获得的经验，才能接受由它的阶级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概念。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的任务就在于争取工人能够接受这些阶级概念。要做到这一点不能靠装腔作势地讲一些听起来慷慨激昂的抽象词句。工人为了争取他们看到的本身的自我利益而参加斗争。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应该善于清楚地表现工人自己所见到的自我利益同这些利益的更深刻的阶级和政治意义这二者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领导艺术要求能够表明工人在所有更为广泛的政治问题上的自我利益。这一点通过一般的口号和抽象的激进词句是做不到的。通过宣言和说教也是做不到的。应当向工人阶级表明，由“真正国际主义精神”出发的政策如何为工人阶级的自我利益服务。

在反对反革命和包括美国帝国主义力量在内的外国帝国主

义武装干涉的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列宁給美国的工人写了一封信。这是呼吁作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行动来保卫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呼吁的根据是指出美国工人在这次革命中的自我利益，是根据对美国阶级斗争的发展水平的深刻的理解。这仍然是列宁能够在紧急关头直言不諱而又保持现实感的例证，是他能够准确而又深刻地把困难問題放在他对于客觀現實的分析的范围之內的例证。这是列宁能够了解作为他的讲话对象的那些工人的具体水平、弱点和优点的例证。在他的信里有这样一段十分有意思的話：

“我們知道，你們美國工人同志們的帮助也許不會很快到来，因为革命的发展在不同的国家是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速度进行的(也不能不是这样的)。我們知道，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不管它近来成熟得多么快，在最近几个星期內还是不会爆发的。我們指望着不可避免的国际革命，但这决不是說，我們就像傻瓜一样指望革命必然会在一定的短期内发生。我們国家有过两次大革命(1905年和1917年)，我們知道，革命是不能按照定单或協約来进行的。我們知道，环境把我們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队伍推到前面，并不是由于我們的功劳，而是由于俄国特別落后；我們知道，在国际革命爆发之前，可能有个別革命遭到失败。”

正如我們所知道的，任何意识形态的基本傾向，都具有阶级的基础。一个阶级同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产生一种意识形态傾向，为这种傾向創造基础。但是它的发展和它之所以为群众所接受，并不是靠直觉，也不是自动的。它的发展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发展必須经过斗争才能得来。馬克思和恩格斯給工人阶级的这一意识形态以科学的范围。他們将它的內容发展成为完整的世界觀。但是，只要世界上任何地方还存在着阶级，世界到处就会有这两种阶级意识形态傾向之間的斗争。

只有一部分反复出現的經驗的成果才变为可以继承的意识形态的遗产。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意识形态倾向的发展落后于其他发展。因此，甚至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消失以后的一段时间內，还必須进行斗争来爭取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占优势。

这同认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阶级斗争还会继续更加尖銳化的这一錯誤思想并沒有任何共同之处。这仅仅意味着，共产主义新人成长的过程将通过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才能进行。現在，正在进行着的斗争是反对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遗留下来的资本主义思想以及来自尚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思想。在一定的时期內，馬克思主义者看待反对敌对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應該像天文学家对待已经离开了天体但是继续在外层空间活动的光线一样。

現在，全世界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还應該把爭取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占优势和在自己的队伍中消除非无产阶级影响的斗争提到更高的水平，把它当作极重要的关键性問題。在这場斗争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概念一定要占据最高的优先地位。这是非常必要的，不是因为我們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找到支持这种观点的引文，更多的是因为这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战略和策略中絕對必要的組成部分。对工人阶级的这些概念的削弱、狭隘民族主义对“真正国际主义精神”的进攻，已经給我們阶级的事业帶來了无法估計的損失。

世界上各馬克思主义政党中的大多数党员都不是工人，而且即使他們都是工人，这件事情本身也不能保证什么。也不應該因此得出結論认为：馬克思主义者現在應該鼓励人們不要去爭取非工人阶级的阶层参加进步和社会主义的事业。这意味着，世界各国馬克思主义运动的领导者應該警惕，更加注意来自社

會上非工人階級階層的意識形态的影響。只有正確地理解工人階級的作用及其產生的概念，才能夠爭取人民中的非工人階級階層，使他們參加反對資本主義罪惡的鬥爭。打算讓其它非工人階級分子代替工人階級的作用的一切企圖，都像方枘圓凿一樣。只有正確地看待工人階級的地位時才能在鬥爭中建立恰當的同盟和聯合。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錯誤觀點，從根本上來說只能解釋為工人階級概念和工人階級意識形态的削弱以及非無產階級影響加強的結果。他們的政策在少數黨的領導機關里得到了某些支持，只是因為那裡也存在着同樣的階級弱點。大國沙文主義、狹隘民族主義，這都是資本主義制度在意識形态方面的產物。它們在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态里是沒有地位的。對本國人民的成就可以有、而且應該有一種健康的自豪感，但是不應當使它墮落成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對本國的自我利益可以而且應該关怀，但是不應當讓它變成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像解決邊界糾紛、社會主義各國之間的兄弟般的合作關係、社會主義各國之間建立互利的國際分工體系的必要性、對1962年加勒比海危機的態度，在所有這些問題上，都缺少工人階級的態度。他們是從狹隘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觀點出發來討論和看待這些問題的。同樣明顯的是，他們並沒有把社會主義的興起看成是階級鬥爭的延續，是我們時代中主要矛盾發展的結果。在他們看來，階級鬥爭已經由民族、種族和地理區域之間的鬥爭代替了。這些概念事實上就是小資產階級否定資本主義的階級性，是拋棄階級鬥爭，是否定工人階級的歷史作用。

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基本階級矛盾的性質本身就要求制定出一整套政策，要在兩個階級、兩個體系的鬥爭中取得勝利，社會

主义部分必須在生产水平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部分。苏联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威力是社会主义部分的主要基础。世界社会主义的这一主要经济基础应当继续得到尽快的发展，这是符合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利益，符合全世界一切工人的自我利益的。但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使我們的中国同志看不到这一现实。他們反而說，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进行共产主义建設之前，一个国家使用其庞大的經済能力在本国之内建設这样的社会是錯誤的；实质上他們是說：停止发展，將資源分散，以便将所有国家的生产提高到同样的水平上。由于这种錯誤的概念，他們贬低了并且錯誤地解释了苏联給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內所提供的巨大援助。

如果当时苏联不把建立这个强大的工业基地，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核潜力在內放在最优先的地位，那么，世界上的力量对比就不会发生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变化。当然，如果人們不把世界战争的危险看成是人类事务中的消极因素，就会认为这沒有什么重大的意义。苏联在向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尽可能多的援助的同时，继续把尽快发展自己的工业基础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这是符合世界和平、反帝斗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最迫切的利益的。美国人民已经从两种制度的竞赛中获得了某些好处。貧穷在我們这里从来没有絕迹过。但这一竞赛逼出了一个“向貧穷宣战”的运动。这一竞赛和殖民地各国人民的胜利，是爭取美国黑人平等的民权斗争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和平共处政策也完全符合阶级斗争的概念。这是工人阶级在某一国家內成为国家政权的领导力量的时候必须立即奉行的政策。事实上，这是工人阶级在某些国家中成了国家政权的领导力量，而资本主义在其他国家中仍然掌握政权这种历史转折点的时候的阶级斗争政策。美国最反动的极右力量提出了“同

社会主义和平共处就是致美国资本主义于死地”的口号，这不是偶然的。

主张一切民族有权决定自己命运的政策是由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产生的。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拒絕这一政策特別有害于反帝斗争的事业。使今日爭取擺脫帝国主义而独立的斗争增加了特別重要的新性质的，恰恰就是因为这些斗争同日益成为生活中的統治因素的阶级——工人阶级及其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联系。事实上，要充分理解和体会殖民地各国人民爭取独立和自由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必須看到这一发展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让位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这一时代的联系，看到它与战胜腐朽的资本主义阶级的那个阶级的联系，这也許是最起碼的常识，怎么可能看不到为从帝国主义解放出来而斗争的人民，同为消灭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工人阶级二者联合起来的重要意义呢。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說，他們同世界馬克思运动在这个問題上的分歧在于，“承认不承认被压迫民族有权解放自己”，“支持不支持解放战争”。这样地提問題，是不负責任的誹謗，同真正的問題并沒有任何关系。如果这些被压迫民族听从北京的劝告，拒絕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因为苏联只有一部分領土在亚洲而拒絕同苏联发生任何关系，如果被压迫民族听从北京“依靠自己的資源”的劝告，接受把反帝斗争同世界工人运动分幵的概念，那末，它們又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支持呢？接受这样的劝告就等于抛弃他們的王牌。的确，問題正是“支持不支持”。但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在說不要支持，而且实际上它是在向新获得解放的国家說，“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提出支持，你們不要接受它。”

将反帝运动以及刚获得解放的国家和民族同工人阶级和社

社会主义国家分裂开来的企图，就是在当代两个最自然的同盟者之間制造矛盾和对抗。这也是企图分裂一个能置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于死地的联盟。

从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間阶级斗争的前后关系来了解各种运动、斗争和潮流之間的相互联系，就意味着給所有这些运动注入新的精力和前景。正是这种理解才給解放运动增加了对工人阶级的信心。

沒有对阶级的作用的这一正确的基本理解，就不能正确理解和对待像政治联盟或在斗争中的暂时联合和暂时同盟者这样的問題，也不能正确了解爭取改良的斗争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間的相互关系，以及如何利用敌人阵营内部的矛盾，反对垄断资本政权的斗争的作用和意义及其它許多問題。沒有阶级的理解，所有这些都会成为沒有一定范围和前景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矛盾。

一切策略和战略問題都是同基本估計紧密地联系着的，如果对工人阶级缺乏信心、也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規律以及这些規律同阶级斗争的联系，就会产生許多錯誤的策略和战略概念。如果对工人阶级沒有信心，你就不会信任群众斗争以及群众影响历史进程的作用。如果对于工人阶级沒有信心，就会出現輸入和輸出革命的思想，因为对內部力量既然沒有信心，你就会去寻找外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如果认识到社会革命是不能“按定单进行的”，那么，不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如果对于阶级斗争的基础有了这种深刻的馬克思主乂理解，所有这些政策就成了互相联系的，而且都有适当的地位。

“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需要继续不断地加以重申，并为之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企图在馬克思主乂的工人阶级的政党

中制造分裂，他們显然是缺乏这种精神的。当他們公开支持政治蛻化分子、叛徒、冒险家以及被各国共产党开除的不負責任的分子的时候，这种精神就不存在。在他們对世界各国共产党領袖进行激烈的和无原則的攻击的时候，也沒有这种精神。特別不負責任的是采用了从第一国际时代起資本主义最反动的代表所散布的陈腐謠言，說共产党是某个外国的代理人。早期美国的战士曾被称为法国的代理人。現在則把共产党人指控为莫斯科的代理人。第一国际在章程中有一条这样写着：“他們宣布，这个国际协会以及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們彼此間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現在的某些馬克思主义者不妨把这句名言上堆集的灰尘撣一下，这样用去的时间不会是浪费的。

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产生自己的先鋒队政党。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是没有統治的党的。要成功地应用馬克思主义的科学，只有当这种科学掌握在那些是本国人民自己的斗争、经验和历史的当地产物的人們手里时才有可能。至于其它国家工人的特殊经验在某一国家內是否可以应用，只有这个国家的馬克思主义者才能最好地决定。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作为基础，拿来发展那些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和理論的普遍性和正确性的概念。这不应当成为有些党采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非工人阶级政党的特点的烟幕。这不应当成为用非阶级的概念去代替馬克思主义关于資本主义阶级本性这一基本概念的伪装。这不能成为让“真正国际主义精神”这棵树枯萎，被狭隘民族主义的莠草和苔蘚窒息的借口。

我們馬克思主义者，否认任何說我們不忠实于本国人民和不爱护本国的概念。正是由于我們对本国人民的深切关怀，才使我們成为共产党人。

資本家階級捏造所謂“外國代理人”的罪名，還進行希特勒式的指責，說一切共產黨都參加了一個世界性的陰謀。我們否認這種誹謗，但同時我們不應當讓這種誹謗運動把我們趕進狹隘民族主義的羅網。列寧說：“我們是反對民族仇視、民族糾紛和民族特殊化的。我們是國際主義者。”《北京周報》却企圖用民族主義的概念代替這一工人階級的概念。有時民族主義精神的確在正義的鬥爭中為團結的目的服務。這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尤其是這樣。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公認讓民族主義代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這種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

既然美國帝國主義是把自己貪婪的觸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的侵略的反動力量，那末美國工人階級就擔負着特殊的責任。在我們的工人階級還沒有充分準備承擔這一責任以前，它的先鋒隊就應當替它承擔起來。根據本身的自我利益而建立的階級團結精神，應該特別推動美國的工人階級成為制止反對古巴共和國的侵略政策，爭取從東南亞和中國領土台灣撤出美國武裝力量這一運動的骨幹。

對於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來說，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是一個經常而特別尖銳的問題。大國沙文主義的影響和白種人沙文主義的意識形態是提高階級覺悟和社會主義覺悟的道路上的障礙。白種人沙文主義是我們工人階級達到團結的障礙，因為黑人工人構成我們工人階級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在美國，工人階級必須克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這些主要支柱，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才能佔據優勢。

在第一國際以後，恩格斯充滿希望地說：“單是憑靠那以同樣理解自己階級地位為基礎的團結感，就能由一切國家和各種語言的工人造成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政黨並支持這個政黨了。”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從來也不相信自发性，從來也沒有推論說

不经过努力和斗争就能作到这一点。世界馬克思运动應該准备采取一切措施——意识形态方面的和組織方面的——来将爭取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占优势并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概念增添新內容的斗争的这一运动提高到新的水平上。

爭取确立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占优势和爭取一个統一的世界馬克思运动的斗争，不是一个在今后許多年內可以束之高閣的問題。所有欢迎分裂并把它当作进步和取得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的手段的思想，应当作为在实际上和科学上都毫无根据的思想加以摈弃。

所以，我們主张召开一次全世界共产党的會議，不像认为这样的會議只会导致分裂的人那样担忧。世界會議只有一个目的。这次會議将提供条件使得世界馬克思运动可以把自己队伍重新團結起来。

当年第一国际是当时工人阶级斗争水平的反映。共产国际反映了自己时代的事态发展和問題。現在，世界工人阶级达到了新的水平，成了越来越能决定历史进程的那种力量的核心。这使本质上不同的新責任又落在馬克思工入政党的肩上。所有的良知和生活本身，特別是生活中阶级斗争的因素，要求这些政党寻求通往團結的道路，要求它們寻求完全符合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新任务的各种形式的关系。

（譯自1964年8月号《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英文版）

意识形态冲突的目前状况^①

葛斯·霍尔

現在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四年中所奉行的分裂方針已经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整个反帝力量中造成相当大的損害。过去，我們曾談过这种方針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現在这种影响已经成为現實，成为形成今天的政治現實的一个因素。

当然，我們必須避免任何根据分裂来解释一切事物的趋势。但是要是我們继续只談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那只能欺騙我們自己。我們必須清醒地估計所造成的損害，并弄清楚責任所在。如果以努力爭取團結为名而置这些事情于不顾，那是幻想。明显的事實是：由于这种分裂，世界反帝力量一直未能充分发挥潜力；这种分裂已造成了混乱；应当團結起来的力量却朝着不同的方向行事。

人們很难掩飾中共政治路线和分裂行动已造成的損害，例如对印度进步力量所造成的損害。由于这一点，在印度这个有着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的历史上最关重要的时刻，反帝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在很大程度上陷于混乱。这明显地加强和鼓励了那个国家的反动力量。在那里，消极的影响是特別明显的。在

① 1964年10月，美共将这篇文章寄給我党中央，并附有以下說明：“葛斯·霍尔的这篇文章是根据他1964年9月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一次會議上的报告写成的，预定在11月号的《政治月刊》上发表，由于本文在目前如此重要，現寄上一份供你們閱讀和使用。”但到目前为止，已出版的《政治月刊》沒有刊登这篇文章。——編者

别的地方也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类似的影响。

在委內瑞拉、巴西和智利等国家的斗争中，中共的政策和分裂活动一直是一个消极因素。在智利选举前一个月，中国人散发了一个轻率、不负责任、诬蔑性的文件，攻击智利共产党的政策和领导。它大概没有改变选举方面的总的結果，但是它的确造成了相当大的混乱。

对我们來說，中共路线所造成的所有消极的后果中，最令人不安的是它对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如何利用这种分裂来为它的侵略目的服务，現在已成为中央情报局一心注意的主要目标。单单为了这个目的，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同中央情报局一起就建立了許多研究中心。他們越来越得出結論，认为利用这种分裂来为美帝国主义謀利是可能的。

东京湾事件和对北越設施的袭击事件說明这种分裂继续下去会造成越来越大的危险。我想，人們很有理由說，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是团结一致的，美帝国主义本来是不敢袭击北越海岸設施的。

美帝国主义在它的侵略計劃中是把这种分裂估計在内的，这已经是够严重了。但是，同样严重(如果不更严重的話)的是，帝国主义可能錯誤估計这种分裂的深度，而把世界推过边缘，而投入核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党有义务喚起人們注意美帝国主义蓄意利用这种分裂的情况和可能作出錯誤估計的危险，并据此說明爭取世界范围內的团结的迫切需要。这必須成为我們推動各國工人阶级政党团结的出发点。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現在面临的局势是极为严重的。我們面前所以会出现这种危机，是由于中国党领导人在四年期間形成了一套对立的方針——在根本上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方

針。在像对当前世界力量对比的估計和推进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方針这样一些問題上，从而在几乎所有策略問題上，他們都离开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他們甚至在象阶级和阶级对抗的作用等这样一些基本問題上也抛弃了馬克思主义，而且形成了一套哲学思想，来支持这种背离(馬克思主义)的行为。

因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任务是捍卫和进一步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駁斥中共的建立在狭隘民族主义、小資产阶级激进主义和利用反苏来推进他們的民族主义政策的做法的基础之上的錯誤思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現在面临四年來局势恶化和遇到挫折所造成的結果，在这四年中，曾努力制止或限制公开辯論和把討論限制在馬克思主义者行为标准的范围之内，但是沒有成功。这一斗争是要加强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使它們的根子扎得更深，同时駁斥小資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任务是要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提到新的高峰，同时駁斥狭隘的民族主义。

問題的性质就是这样。現在的問題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們要走向何处？

我已经強調指出，这一切已进行了四年，因为我們不应当好像一切都是从头开始那样来对待這一問題。

1960年的世界性會議是为了防止这样一种发展。我认为那次會議的确曾对分裂加以限制。还举行了許多区域性的會議。《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杂志举行了許多次世界規模的會議，討論了一些具体問題，例如爭取民主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新兴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問題、工会問題和其他問題。一些党派了代表团到中国去，苏共中共举行了一些會議，交換了信件，并派了代表团。因此在提出关于未来的做法的建議时，讓我們吸取过去四年的经验。到目前

为止，所有关于重新回到團結的道路上来的建議都遭到中共的拒絕。

如果我們要认真作出貢獻，我們需要更深入地探討这些发展的一些方面。我們特別必須設法了解为什么既沒有能結束這場辯論，又沒有能对公开进行的辯論加以限制。对这个問題作出回答，将大大有助于认清爭論的性质。

有些人說，立場上的分歧是由于各党所处的具体环境的多样化程度大大增加的自然結果。这种看法是錯誤的。环境多样化并不意味着理論或意识形态方面多样化，并不能取消适用于一切环境的普遍規律。

把分裂的原因归之于环境多样化是为中国的立場辯护。这种差异不能成为世界工人运动四分五裂的正当理由。也不能因此认为各党之間没有必要交流经验和意見。真正的問題是是否应当允許某些党利用多样化作为幌子，来掩盖违反馬克思列寧主义的觀念，而其他党却默不作声。但是沒有能結束和限制辯論的根本原因比这更深。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沒有能回到團結的道路上来的根本的原因有一个，也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共领导不把这种辯論仅仅当做对不同意見的討論，而且长期来一直是如此。現在看来很清楚，他們的分裂性的做法可以追溯到1960年初。从1960年1月开始，中共的方針一直不是进行討論，而是进行大規模的攻击，目的在于控制和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它的目的是改变（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規定的路线，破坏苏共的影响，破坏一切不同意他們的非馬克思政策的党的領導。

因此，他們不是进行討論，而是进行了并且继续进行着一个在工人阶级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组织上的运动，以便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裂。它的轻率态度、它的挑衅性质和

不負責任的性质是罕有其匹的，他們的誹謗和謠言是沒有先例的。

虽然他們表面上同其他党保持接触，他們一直在着手建立一个包括一些国家中的一些集团的世界性的组织结构。他們一直在建立一些区域性的中心，这些中心設在瑞士和另外一些国家，有着大量的人員。他們竭力在每一个国家建立一个由反党集团、不負責任的冒险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形形色色的小資产阶级激进派別組成的骨干。他們退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杂志，而办了他們自己的杂志。他們在言論中反对举行目的在于实现團結的世界共产党會議，而同时却正在组织他們自己的會議，他們利用东京和平會議来为以后在北京召开由他們的人参加的會議作准备。他們花了成亿的美元来建立这个世界性的组织。

看来很清楚，如果双方把爭論看成是討論分歧，爭論就可以按照合理的方式进行，尽管分歧是很尖銳的。但是如果一方只是利用討論来掩盖其他活动，掩盖它的政治目的，它也有它的邏輯。正因为如此，这場辯論具有一种分裂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在我看来，如果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继续按照好象是仅仅討論分歧的方式行事，那就是走继续保持軟弱地位的道路。这是导向分崩离析的道路。

列宁在談到一个在口头上一味讲关于国际主义的漂亮話而事实上走民族主义的道路的集团时曾经說，他們把这看成是“好象在假日在国际主义字眼的花园里散步”。我认为有一些人倾向于把目前的爭論看成是“在假日在團結字眼的花园里散步，把一个事实上是荆棘丛生的地方看成是花园”。

在我看来，閉眼不看这种分裂的真正性质是一切錯誤中最有害的錯誤。这是机会主义和投降的道路。企图把这說成是仅仅是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間的分歧，或者說这只不过是

赫魯曉夫和毛澤東之間的私怨，这只不过是沿着机会主义的道路又向前走了一步。

列宁曾经說过一个人要是为机会主义辩护，自己就一定会成为机会主义者。这种說法是完全正确的。同机会主义妥协不是实现团结的道路。实现团结的唯一真正道路是不屈不挠地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

从来没有过一場反对背离馬克思主义道路的做法的斗争，在其中其他机会主义的弱点沒有表面化。在这种意义上說，目前的斗争也不是例外。

在反对背离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保持任何程度的中立本身就是机会主义的反映。“自主”、“民族特点”、“多样化”都是需要加以發揮的重要观念。然而，如果这些观念成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唯一的推动力量和指导力量的話，那么它們很可能成为机会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的工具。在意识形态方面需要经常地对非工人阶级思想的渗透进行斗争。

虽然人們普遍同意中国領導人在策略方面的立場是錯誤的，人們似乎仍然不願正視造成这种錯誤立場的基本原因。例如問題并不仅仅在于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有分歧，而且在于人們对于如何解决这些分歧的态度是由不同的思想影响所形成的。有工人阶级的观念，也有小资产阶级的观念。有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有同这种态度相反的态度。

有一些人在談到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和农民或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間关系时，主张采取一种“大得足以把两种意识形态都包含在內”的立場。这样說意味着什么呢？意识形态是以一个特定的阶级在社会中的关系为基础的。我們必須区别不同的意识形态，并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但是我們决不能把它們等同起来，或者认为“每一种意识形态都能对馬克思主义觀念的綜合

体作出貢獻”，而把它們溶合起来。这样做将只是模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工人階級意识形态之間的亲密关系。工人階級和农民的聯盟的基础不是意识形态的溶合，而是为共同利益而进行的共同斗争。这是一种以共同的自我利益为基础的聯盟。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工人階級意识形态的胜利。工人階級的意识形态是不能同其他階級的意识形态溶合在一起的。工人階級要爭取其他階級的集團接受自己的意识形态。

我們正在力图建立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團結的性质怎样呢？首先也許我們应当問一下，是否需要重新研究一下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进行更好的協調的問題，即就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关系和交往建立某种制度的問題。

我深信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問題，这是工人階級政党面临的一項关键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我相信这对我们來說是极端重要的，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为第一国际而斗争时，这对他們來說也同样是极端重要的，在共产国际成立以前，这对列寧和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也同样是极端重要的。

当然，其性质、所使用的方法和所建立的組織机构反映了那些时期的問題和条件。它們肯定不能适用于現在。我們的解决办法必須反映目前的局势发展。

有些人警告說，我們决不能建立以共产国际的在组织方面的磐石般的團結的觀念为基础的維持关系的制度。但是这是就一个不存在的問題进行辯論，不仅这个觀念是完全过时的，而且就我所知，沒有任何党派提出过任何这种建議。我們不应当被这种幻象迷惑。重新研究这个問題有什么不好呢？也許我們会得出結論认为建立一个新的联系制度是不可能的，但是讓我們在重新加以研究的基础上这样做。

有些党显然认为它們能象目前这样只管自己的事务，而仅

仅偶尔对世界性的問題发表一些泛泛的意見，而听任中国人在世界上各个地区建立区域性的中心，办杂志和報紙，办学校，制造混乱和进行分裂活动，散布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我认为抱这种看法也是一种幻想。

那些較大的、較老的党也許可以继续这样做，至少暫时是如此。但是那些較小的、較新的党——那些经验較少、工人阶级基础較小較弱的党怎样呢？忽視这些問題是負責的态度嗎，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嗎？这不是反映过分強調自主嗎？不，我們应当大胆地、創造性的处理協調的問題，而不由于过去的錯誤而临陣胆怯，也不陷于过去的觀念中而不能自拔。

維护各个党的自主和就各国工人阶级政党之間的关系和交往的問題保持某种制度两者之間有矛盾嗎？我认为沒有。这种冲突已经发生（或者可能再发生），这一事实正說明我們必須从过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并且采取措施加以防止。

保证自主現在真正是一个問題嗎？无疑，这在过去是一个問題。但是根据这里的情况来看，老实說我不能說在今天这是一个問題。我这样說是因为人們有时提出自主問題只是作为一种掩盖狭隘民族主义的烟幕。在这方面，只有一个例外，只有一个真正的威胁，这就是中共企图破坏我們作为一个党的自主。当他們建立和支持各个反党集团时，就是破坏我們的自主。

在哪些政治問題上必須交換意見和进行討論？一个方面是美帝国主义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同它进行斗争的方法。

我們可以同意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帝国主义的中心，它敢具有怎样的侵略性，就具有怎样的侵略性。但是我們不能同意美帝国主义是唯一值得一提的帝国主义，也不能同意资产阶级是铁板一块的、侵略性的集团。按照这种錯誤觀念，我們不能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成功的斗争。这种觀念本身包含着为其他帝国主

义国家辩护和为美帝国主义当中那些最具有侵略性和最反动的部分打掩护。我們也不能同意这样的看法：争取共处的和平政策是同对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不相容的。与此相反，事实证明，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在今天的世界上成功地进行这一斗争。

同时我們必須拒絕最近在一些地方出現的有关美帝国主义的两个密切相关的問題。当然，美国金融資本正面临着一个日益加剧的危机。由于社会主义世界的日益增长的力量和殖民地解放运动不断取得的成就以及它的帝国主义对手們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不得不后退一些。此外，美国統治集團面临着由于民权斗争大大高涨而引起的固有的危机。正是这种发展引起了两种錯誤觀念。

一种錯誤觀念认为，由于戈德华特被提名担任總統候选人，而且极右派想得到總統职位，因此可以預先断定整个政治战线将一定会向右摆——或者已经向右摆。这样一种觀念表明对美国人民缺乏信心。它体现了对美国人民的性格和历史的一种錯誤的估計。的确，这样一种結局是可能的。但是这不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能性也不大。与此相反，目前的局势包含着把我們国家推向左轉的因素。认为不可避免会出现或者已经存在向右摆的趋势而据此拟訂政策是錯誤的和沒有必要的。

同这种錯誤觀念有关系的是这样一种想法：美帝国主义的危机只能把美国統治集團引向一个方向，那就是反动和战争。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又引起了一个老問題：由于在美国人民中間以及世界規模上力量对比的关系，能不能在不发生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情况下使美帝国主义后退？我們对这个問題的回答一直是：“是的，这是可能的！”

否定这种可能性就是否定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观念之一。我們不能把我們的政策建立在任何认为不可避免地将走向反动

的觀念之上。有些人宣稱對世界力量對比有積極的估計，而現在却對世界事態發展作了消極的估計，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它們只是作為公開決議中的字眼呢，還是對目前現實情況的切合實際的估計？我確信我們的估計是正確的，正因為如此我不能同意認為一切已向右轉這樣一種全面的否定的估計。我們必須看到反動的危險。但是不看到人民民主運動的發展，則是片面的。人們必須看到戰爭的危險，但是人們也必須有信心能贏得和平。

我們能夠作出貢獻的第二個方面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作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在這裡採取的方式跟西歐不同，並且正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一些問題。

歐洲的經驗促使人們提出這樣的問題：工人階級是否能、以及在什麼程度上能利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這種發展來向社會主義過渡。人們之所以以這種方式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西歐戰後的重新建設中包含著三個因素：國內資本、國家和美國資本。這三部分之間的鬥爭提供了進行活動的余地和某些新的可能性。

但是美國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完全不同的，特別從國家所卷入的方式來說是如此。因此對我們來說，提出同歐洲的一些黨內所出現的思想相似的思想是錯誤的，雖然我們不可能預料在一個反壟斷資本的政府下國家壟斷資本結構可能遇到什麼情況。同時我認為在像國家壟斷資本和共同市場這樣一些問題上出現了一些機會主義的觀念。

有待研究的第三個方面是狹隘民族主義的散布，這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新的、特殊的問題。出現這種發展有許多原因，我這裡只能粗略地提一下。一個原因是工人階級同他們的國家有了新關係。第二個原因是，民族主義在民族解放運動中起了重要的、積極的作用。第三，新解放的國家和仍然在爭

取自由的国家中的共产党的成长使組成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各党的阶级成份有了变化。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沒有认真对它进行斗争。杂草不除就会生长。民族主义在斗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已经变成在意识形态上接受民族主义。

把民族主义当做一种进步力量来利用只能是有条件的和暫时的。只有在民族主义同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結成联盟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一点，如果不经常爭取使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占支配地位，民族主义就很容易变得难于控制。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狭隘民族主义就会代替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思想。

理解民族自豪感的作用或者民族主义在爭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中的作用是一回事。当我们談論需要为維护工人阶级思想而斗争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列宁說得好：“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調和的，即使它是最‘公允的’、‘純洁的’、巧妙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馬克思主义提出用国际主义即用各民族高度統一的溶合来代替一切民族主义，这种溶合我們亲眼看到正在隨着……的建立而增长。”

“民族原則在資产阶级社会中有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在估計这个社会时，馬克思主义者完全承认民族运动的历史合理性。然而，要使这种承认不致变成替民族主义辩护，就應該极严格地只限于承认这些运动中的进步的东西——應該使这种承认不致使无产阶级的意识受到資产阶级思想的蒙蔽。”^①

在目前情况下，过分強調“各党的独立”只会导向民族主义。完全用自主和独立思想的奶水一勺一勺喂养大的干部将成为狭隘民族主义政策的俘虏。

^① 《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卷第17頁。

每一个党都必須有意识地为国际主义思想而斗争。每一个党在这个斗争中都必須有它自己的关键性的問題，有它自己的手段来用国际主义教育干部。在我們国家里，这个关键性的問題就是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它在国内的表現——白人沙文主义。

我认为要能完全成功地对一切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影响进行斗争，不管它是大国沙文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就需要有一种交换意見和保持国际关系的制度。如果没有这一点就必然会在大多数問題上产生片面性。举例說，在有些人看来，巴西的事件是过于依靠和平方法的证据，但是对这些人來說，委內瑞拉的局势发展却沒有证明什么。沒有一种交换意見的制度就不能集体作出理論方面的結論。沒有一个党能够在理論上对人类历史上的这个最活跃的、富于爆炸性的时代的事件作出結論。

世界上各国共产党在这場爭論过程中受到了四年的鍛炼。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走，有的走得慢一些，有的走得快一些。走得慢的原因是仍然对分裂的性质抱有幻想。中国人有一个时候曾经就举行他們自己的世界性會議进行試探，当他們不能得到足够党的支持的时候，他們后来就罢手了。但是这件事表明，只要他們有希望得到支持，他們就会力促举行會議。这表明如果所有党先前都采取更坚决的立場，本来是可以更有效地和更早地制止咄咄逼人的寻求分裂的运动的。

在我們自己党的干部中，我們碰到这样的例子：每當中国人发表一种新的錯誤的策略性的主张时，有人就会大喊“不可思議”、“出人意外”、“不幸”、“有害”；每當中国领导人采取新的行为时，这些同志們就被迫勉強地稍微向前走一点，來設法了解这种分裂的全部性质和（中国领导人）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的程度。

但是这难道不是表明軟弱嗎？有一个时候迟疑不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四年來被策略方面的局势发展推一推动一动，而不作出結論，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认为这也反映出不願意去理解造成錯誤的策略立場的基本原因。如果我們检查一下这种态度，我认为我們就能发现，这些人沒有清楚地理解所涉及的問題。

在策略方面不同意中国人的意見不能作为衡量其理解程度的真正尺度。几乎沒有人敢公开支持中国人在策略方面的立場，連反党集团也不敢这样做，但是我們常常听到这样的话：“我不同意中国人这方面的意見——但是。”接着围绕着这个“但是”进行討論，事实证明这是为中国人的立場辩护，或者常常是对苏联的立場进行攻击。也有人这样說，“我們大家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中共是多么的錯誤，但是我們決不能以同样方式作出回答。”

我們值得向自己提出一些問題。我們是怎样解释中国人在禁試問題上的立場的？我們是否說，是的，他們是錯誤的，但是“他們是在不同的狀況下行事的”呢？还有我們是怎样解释“苏共同美帝国主义勾結”这样一种指責的？我們是否一方面以“自主”为名在公开的場合默不作声，一方面私下对苏联共产党人說，中国人的这种攻击是沒有效果的，甚至共产党人都怀疑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发生这样尖銳的冲突？

不難使我們的党员反对这样一些策略方面的主张，这并不使我們感到意外。但是如果我們停留在这里，我們就会使他們对根本問題“懷疑”。如果他們有怀疑，那只是因为沒有對他們解释造或这些錯誤的策略立場的基本原因。在这方面，問題也不是我們是否拒絕这些錯誤的策略立場，而是我們如何解释促使中共采取这种立場的原因。不能使這些問題停留在“好人和坏人”理論的水平。我們必須找出这种根本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

的态度的階級根源。

我們必須作出这样的解釋：这根本背离馬克思列寧主义在下列这样一些問題上的态度，階級斗争和階級的作用，資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民族主义的性质和作用，对世界力量对比的估計，爭取和平斗争的新的性质。我們必須解釋中国人的主张，例如“愈糟愈好”（我們的許多朋友錯誤地认为這是我們的政策）。我們必須解釋反苏作为資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的历史性作用。

有些人显然认为我們应当默不作声，至少是不提出批評，而让中国领导人继续把他們的攻击針對着苏联。有一些人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主张利用反苏来证明自己的独立和自主，或者作为同帝国主义国家簽訂貿易條約的代价。我們坚决反对任何这样的想法。反苏仍然是資本家的意识形态武器庫中的最重要武器。帝国主义勢力願意为任何反苏的表現付出极大的价錢。反苏仍然是他們分裂和瓦解全世界进步力量的活动的关键。

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呢？因为我們不采取这种态度就不能保卫馬克思列寧主义，而只能一一駁斥策略方面的立場。如果我們只这样做，我們将会遇到这样一些情况：在一个时候在策略問題上表示贊同的同志們似乎在一夜之間轉面采取相反的立場。例如同志們可能“突然”在我們的选举政策上产生混乱。我們現在正在爭取人們支持这种政策，这主要因为不可能奉行在很大程度上仿效中共立場的《每月評論》那样的政策，否則就会被人当作疯子，我們不应当感到滿足。相反地，我們应当抓住策略方面的这种有利的局势，來对我們选举政策的基础作出更加深入的解释，來解释我們的政策和策略的更深刻的意义。

还可以举另一个例子。在三十年代妨碍左派團結的主要障

碍是：一，反共；二，我們党的宗派主义的政策；三，托洛茨基主义的作用。但是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們仍然必須对反共主义进行斗争，但是現在造成新障碍的是托洛茨基主义和力图把左派孤立到狭隘的宗派主义的墙角落去的新牌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合流。他們說，他們現在看到了法西斯主义和戈德华特主义的危险，但是他們不肯采取任何行动来建立人民民主阵线，来反对这种危险。而这一切都是以“良心的纯洁”为名和在激烈的詞句下面进行的。戈德华特担任候选人以后曾迫使一些人在策略方面作了一些退却，但是基本障碍仍然存在。

我們必須处理像爭取进行改良的斗争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間的关系这样的問題。我們必須令人信服地表明后者怎样是前者的继续。如果我們不这样做，中国党的小资产阶级激进路线就要来了：“越糟越好。”支持我們的人就会受到一种錯誤思想的影响，认为改良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障碍。如果改良是騙人的东西，为甚么要費力气去設法使美国群众支持爭取改良的斗争呢？为甚么費力气去注意资产阶级队伍里的分歧呢？一些左派力量已经接受中共的看法，认为民权法案是一种騙人的东西，这难道不是事实嗎？

最后重建意识形态上的团结的前景怎样呢？有人说，沒有这种前景，实现这种团结是一种沒有希望的任务。我不能接受对于中国共产党或者它的领导的这样消极的估計。

对有些人來說，这种消极的估計已成为不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斗争的借口。因为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何必在意识形态問題上进行斗争呢？何不仅仅呼吁在关于具体問題的策略上团结一致呢？

我們为意识形态上的团结而斗争，因为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取得成功，因为我們认为中国党并不是无可救药地处于小资产

階級激進主義和民族主義陣營中，因而沒有希望了。這種消極的看法已成為不在意識形態方面進行鬥爭的借口。反對建立一個磐石般的世界組織機構是一回事。但是不能把這作為反對爭取意識形態上或理論上的一體觀念的理由。後者必須始終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努力實現的目標。

我也不可能接受這樣一種論點：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還沒有為下一步舉行國際會議作好準備。我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估計比這來得高。有人說：“我們有問題和分歧；因此我們不敢在一起討論，因為這樣一種討論可能導致分裂。”我們不能理解這種意見的邏輯。

真正的危險在於繼續聽其自流，讓民族主義的離心力造成分裂，每個黨各按自己的方向走，而中共領導人則全力建立他們的區域中心和他們自己的世界性組織。

因為我們主張採取一切可能的步驟來實現團結，我們支持蘇共提出的成立一個編輯委員會來為一次世界性的會議準備材料的建議。我們主張舉行一些世界性的會議來討論今天的問題，主張建立更好的條件來集體作出理論上的結論，主張建立一個更好地協調各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的制度。我們主張同美洲的兄弟黨討論建立某種區域性的聯繫制度。

我們認為這個編輯委員會應當準備一些文件，說明最近的世界局勢，說明如何實現和平和擊敗世界帝國主義，說明新獨立的國家怎樣能夠走向社會主義。該委員會還應當研究反對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鬥爭，應當進一步研究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

這個編輯委員會應當特別注意限制狹隘民族主義的影響，加強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影響，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成為光榮的標誌和群眾的政治武器。它應當更深入地研究和平共處及其

同爭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关系这样一个中心問題。

不管有沒有分歧，在世界上各个自主的共产党的兄弟般的集体中，始終需要会晤和交換经验。

一些人士对一次世界性會議感到担心的是甚么呢？

在资产阶级报刊上，有很多文章說，有人担心这样一次世界性的會議会“开除”、“斥責”或“革除”一些党。这完全是胡說。只有那些用老眼光看待世界性會議的人才能有这种荒唐的想头，原因很简单：沒有任何拥有这种权力的世界性机构。沒有人这样想——根据今天的現實情况也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如果所有参加这样一次會議的国家都抱着一个目的，即开始重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人們怎能得出結論，认为这只能造成分裂呢？有人承认有不同意見和分歧，說他們主张团结，然而却拒絕参加必然导向团结的討論。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医治世界共产主义——馬克思主义政党大家庭中的分裂是工人阶级历史上沒有前例的一种艰巨任务。

让編輯委員会来探討在哪些方面能够举行一次国际會議。的确沒有任何党能反对参加这样一个會議！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①

海曼·路默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引起的意识形态爭論不仅体现了国际上而且体现了我国左派内部在一些最基本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問題上的尖銳分歧。本刊过去在編輯部文章中曾经談到这些問題。文章的題目是《美国左派中的意识形态斗争》(1963年8月)和《論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立場》(1963年10月)。我們打算在本文中和以后的一些文章中更加深入得多地探討这些問題。

这不只是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支持他們的美国人的錯誤立場进行論战的問題。因为这些錯誤既不是完全新的，也不是中国领导所特有的。这些錯誤我們也容易犯，也必須经常保持警惕。因此，这些爭論問題同美国的形势和美国共产党人的工作和任务有直接关系。

但是所牽涉到的問題远不止这些。資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和今天世界力量的新的对比是一些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我們不能不更深入地探討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更好地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并且根据新形势和我們面临的新問題进一步闡釋这种理論。

在我們国家，黑人自由运动的巨大高涨、新的技术革命的日

① 本文是根据在1963年10月間一次會議上提出的報告的一部分写成的。文中談到的問題有一大部分是其他作者談到过的，特别是在过去一年中談到过的。請讀者特別參閱《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1964年7月号上刊登的魯繩采夫所著的題為《關於我們時代的基本矛盾》的長文章。

益增长的影响、美国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中的日益低落的地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最近若干年的另外一些重大发展，提出了許多新問題，必須适当地解决这些新問題，才能有效地促进美国劳动人民的利益，并且指引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处理由于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冲突而突出了的基本理論問題的时候，我們必須考慮这些情况。

但是首先必須清楚地认识意识形态爭執和有爭論的基本理論問題的性质。我們打算在本文中研究这些問題。

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

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基石是辯证法，而这种方法的核心又是揭示和調查一切現象本身包含的、构成一切变化和发展的动力的内部矛盾。用列寧的話來說，辯证法的实质是：

……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都在內)的一切現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統一来认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①(着重点和异体字是原书中的。)

因此，在研究当前的社会发展时，这必須是我們的出发点。事实上，围绕着目前的爭論的主要問題是正确理解现代社会的矛盾問題，我們在下文中可以看到，中国党的錯誤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于对这种矛盾的分析有毛病。

当我们进而研究人类社会时，人类社会不是向我們提出一个矛盾，而是一大堆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并不是同等的。其中的一个矛盾是一定的社会的基本的或中心的矛盾，所有其他矛

^① 《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8卷第408頁。

盾都是从这个矛盾中产生的。基本矛盾是这样一个矛盾，它确定具体的社会结构的基本性质，并且决定它的发展方向，从而对所有其他矛盾的作用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它的形式是由社会发展每个阶段特有的生产方式在客观上决定的，它在整个这个阶段都采取这种形式；等到这个矛盾进入新的阶段而得到解决时，它将以新的形式出现。

馬克思主义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整个进程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生产工具和操纵生产工具的人）和生产关系（据以进行生产的经济关系）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它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是社会化的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资本主义越来越多地用大量的个人共同进行的大规模生产代替个体生产，但它保持前一阶段的特点，即生产手段和产品的私人所有制。恩格斯在谈到这一点时写道：

“在这个使新的生产方式带上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中，已经包含着一切现代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的统治，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中和在一切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国度内，变得愈加完全，因之，也就愈加把个人生产变成仅仅是很少的残余，社会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不可并存性，也就愈加尖锐地表现出来了。”^①（着重点是原书中的。）

这种越来越不协调的现象引起了一场越来越大的斗争，争取消除这种现象，用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来代替私人所有制——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因此，这个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是阶级斗争，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可以说就是社会化的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的具体表现。在工人阶级方面，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反对资本家占有和构成这种占有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65页。

的基础的剥削的斗争，它的根本解决办法在于工人阶级得到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

社会发展的整个资本主义阶段的标志正是这种斗争；对所有其他斗争来说，这种斗争也是基本的。这些斗争中主要的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国家中的资本家之间的对立，这种冲突和对立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剥削扩张到国际范围的结果。

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一切矛盾都大大尖锐化了，特别是那些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矛盾大大尖锐化了。但是基本矛盾仍然没有改变：所有其他冲突和斗争都是在资本主义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斗争的中心范围内进行的，并且受到这种斗争的决定性的影响。

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今天的阶级斗争

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梦想变为现实。随着十月革命的发生，阶级斗争具有新的规模：产生了国际范围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随着社会主义后来在世界三分之一的地方得到胜利，这个矛盾大大加剧了。

在世界上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化的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已经消除，在这里，工人阶级已成为统治阶级。随着这种情况的出现，阶级斗争已经扩大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世界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因此阶级斗争也越来越国际化，正是这种国际规模——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老的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矛盾——已变成基本的东西。

今天世界的中心特点是社会主义存在，而且力量越来越大。这个主要事实构成了1960年八十一党声明的出发点，这个声明

談到“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們的时代”。声明接着說：“我們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声明又說：“在現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內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

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一部分地区的胜利，从一开始就引起了爭取和平共处的斗争。很明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斗争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一方面，它可能爆发为剧烈的冲突，而以核战争作为頂点。另一方面，它可能沿着两种制度之間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的道路发展。这就是說，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但是，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两个不变的社会制度靜止不动地共处。相反地，这是一个新的、日益发展的制度同一个老的、垂死的制度之間的共处。这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是爭取建立新社会和防止核战争的一种手段，核战争的毁灭性影响将使这种斗争遭到无法估計的挫折。

当前所有的其他矛盾正是在这种范围内起作用的。一切都受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間的中心矛盾的决定性影响。各别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阶级斗争是如此（社会主义世界的日益增长的力量大大鼓舞和加强了这场斗争）。民族解放运动是如此（这个运动在最近若干年取得的重大发展取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支持）。各帝国主义之間的对立也是如此（社会主义对于各帝国主义的共同威胁在不小的程度上影响着这种对立）。

因此，社会主义日益增长的力量和威信是所有其他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胜利发展的条件。但是，这种关系是两方面的。其他斗争的胜利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样是极端重要的。因此，要

战胜世界帝国主义，就需要把这种斗争融合为一个反帝共同战线。在下文中我們还要談到这一点。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从对阶级斗争的首要地位的认识中产生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如果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界限在于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界限，那么就可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人中间的最基本的联系是使他们同所有其他工人——他们自己国内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反对进行剥削的资本家这个共同敌人的联系。

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他们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基本利益把一切国家的工人团结在一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手册》（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63年修訂第二版第305页）写道：

“工人不拥有把人们分开的私有财产，也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而需要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劳动人民抱敌对态度。相反地，一切国家的工人有着同样的基本利益——消灭资本主义压迫。这个利益使他们团结一致反对资本的国际力量，使国际主义不仅对工人来说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中表明了这一点。这句话是一个不朽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完全相反的是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它不是把阶级界限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东西，而是把民族界限当作基本的，不是把工人不分民族与其他工人的联系当作基本的东西，而是把不分阶级与同一民族的所有其他人的联系当作基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

求全力反对民族压迫的一切表現和形式，剝削阶级把民族压迫作为使他們对所有工人的压迫长久存在下去并加紧进行这种压迫的工具。它要求把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同阶级斗争联在一起，认为这是两种斗争得到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则要分裂不同国家或民族和工人，使民族解放斗争同阶级斗争分离，从而使这两种斗争都受到损害。

随着苏联的誕生，象阶级斗争一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也扩大了范围。于是，它包含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关系。因此，苏联依靠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来对付世界资本主义为了摧毁它而进行的活动，而另一方面，它又成为进行斗争的工人和为爭取自由而进行斗争的被压迫人民的堡垒。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現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事情又有了另一个方面。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今天还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合作和互助的关系，根据这种关系，每个国家不是独自地建設社会主义，而是作为集体的一部分，依靠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和資源來建設社会主义。

中共在基本矛盾問題上的立場

上述的一切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中国共产党领导所违反的正是这些基本的原则。他們的錯誤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他們不理解关于基本矛盾的概念。这清楚地表現在人們熟知的中共中央委员会1963年6月14日的信件(《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議》，北京外文出版社，1963年)中。这封信在談到现代社会的矛盾时說：

“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什么？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向來認為，这些基本矛盾是：

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资本主义国家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
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間、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間的矛盾。

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內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在这里，他們直接違反八一党声明，不加区别地简单地把矛盾加以罗列，使所有矛盾具有同样的意义和地位。如果說他們向我們提醒什么的話，那就是提醒我們不要过分重視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間的矛盾，尽管这个矛盾很尖锐。

这种提法也暴露了他們把关于基本矛盾的概念同在一定时候哪一种矛盾最尖锐的問題混淆起来了。这种混乱不是現在才有的。早在毛澤东在1937年写的《矛盾論》一文中就有了这种混乱的萌芽。在那篇論文中，他首先正确地提出了总的觀念。他說：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規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

但是他接着說：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現着复杂的情况。

当着帝国主义国家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團結起

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間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便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黑体字是本文作者标的。）

在这里，又把中心問題同尖銳問題混淆起来了。毛取消了关于一定的社会結構本身固有的基本矛盾的概念，而代之于关于“主要”矛盾的觀念，这个矛盾的作用可能改变（尽管是暂时地），从一个矛盾变成另一个矛盾，特別是变成压迫国家和被压迫国家之間的矛盾。

不錯，在不同的时候，这种矛盾或那种矛盾可能变得特別尖銳，从而成为斗争的焦点，对所有其他斗争具有决定性意义。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斗争就变成了中心問題，全民团结爭取在战争中得到胜利就成为首要的考慮。但是基本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間的矛盾；的确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研究战争問題，才能对战争本身有正确的了解。为战争打开大门的绥靖政策不是一时的疯狂行徑，而是一种为了消灭苏联而精心策划的战略。如果希特勒在战争中取得胜利，那么不仅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会被消灭，而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会被消灭。另一方面，由于战胜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就从一个国家扩大到包含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一系列国家。

当时在我国，正是工人阶级和黑人是爭取胜利的最坚决的力量，而一大部分垄断資本却裹足不前，勒索高额利潤，继续同敌人打交道，并且大叫大嚷地抱怨說，我們打的是一場“錯誤的”战争。而且，对于一場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來說，无论是否保卫工人的利益，反对大資本为了把一切牺牲加在他們身上而进行的活动，或者是加紧进行反对歧视黑人的斗争，都是必不可少的。的确，由于我們离开了这种认识，而陷入白劳德主义的泥潭

(自勞德主义认为全民同“进步的”資本家團結一致已永远成为我們社会的基本关系，而把阶级斗争降到次要地位），我們削弱了我們自己对这种胜利所作的貢献。

中共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在毛关于“主要”矛盾的概念指导下，就不再根据社会結構客觀地决定基本矛盾，而是借口眼前的环境把这个或那个矛盾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今天根据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情况，中国共产党領導进而使帝国主义和被压迫国家之間的矛盾具有“主要”矛盾的地位，而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降到第二位。6月14日的信說：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統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它接着由此得出这样的結論：“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說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終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轉移。”

因此现代社会基本上不是按照阶级原則划分的，而是按照地理原則划分的。如中国共产党領導人一再引用的格言所說的，“东风压倒西风”。这最后导向把世界上的基本矛盾說成是有色人种和白人之間的矛盾，这是一种助长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看法。这样一来，中共就抛弃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而实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在采取这种立場时，中国领导人指責苏共和其他党贬低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和历史前途在于同社会主义世界和国际工人阶级坚决結成联盟。

在这方面，苏共对6月14日信件的复信(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說：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強調指出民族解放运动及其伟大未来的世界历史意义，但他們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进一步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同作为反帝主要力量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結成巩固的同盟和合作，同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結成巩固同盟。这种立場是在1960年的声明中确定的。这种立場所依据的，是列宁关于工人阶级的领导（领导权）是反帝斗争取得胜利的条件的思想。只有在取得这种领导权的条件下，这个运动才能最終具有真正社会主义的性质，才能以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过渡来完成。”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寻求这样一种同盟，而是要以解放运动代替工人阶级作为全世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领导力量。这样一来，革命的先锋队不再像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的那样是工人阶级，而是被压迫国家的人，是一切阶级的人。6月14日的信說(15頁)：

“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們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貴族。”

中共頌揚这些分子的革命作用，而贬低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这样他們就抛弃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而采取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

推动这些非无产阶级阶层的思想不是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当然，这种民族主义在今天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起了进步作用，而且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承认它的民主的潜在力量。例如，列宁曾经說过：“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含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內容，而

我們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內容，同时要严格地区分企图使自己民族具有特殊地位的趋向，……。”^①（着重点是原书中的。）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承认这一点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他們自己陷入資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潭，忽視了这种民族主义即使从最好的情況說也有反动的一面，同时忘記了，如列寧指出的，对工人阶级來說，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努力把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爭取无产阶级成分在斗争中的领导权，并且把这个斗争同世界工人阶级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融合在一起。相反地，中国的立場則会按照民族原則分裂国际工人运动，把民族解放斗争孤立于这个运动之外，并且破坏被压迫国家本身的阶级斗争。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采取了一种为了維持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战线”而把阶级斗争緩和下来的政策（这个战线大概包括对印度尼西亚群众进行最野蛮的剥削的地主和外国垄断资本的代表）。

而且，虽然摧毁殖民主义制度有助于摧毁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民族解放斗争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摧毁宗主国中心的帝国主义堡垒。这是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斗争的任务，象中国领导人那样把这种任务一笔勾銷，实际上是放弃消灭帝国主义的目标，认为这是沒有希望的。此外，工人阶级是被压迫人民在爭取自由的斗争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盟友。

单　　干

中共的民族主义也表現为其他的形式。这里我們只想簡略

① 《列寧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12頁。

② 同上书，第410頁。

地談談這方面的問題。

現代技術的發展使各國之間不能不實行越來越多的分工和經濟上的相互依靠關係。資本主義的實質是剝削，因而除了控制和壓迫其他國家以外不能有什么“合作”的關係。但是，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則可能有完全新的關係——作為平等的成員進行真正的經濟合作的關係。這樣一種合作要求制定一項总的均衡的經濟計劃，而協調各國的投資、生產和研究計劃，以便避免重複和最好地利用各國的資源和設備。這種合作還要求按照計劃在各國之間開展國際貿易，建立聯合電力網，興辦其他聯合事業。

但是，這種合作和互助關係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隨著自動化的发展（它使生產的規模和社會化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增加得更快），這種關係變得更加迫切了。

中共領導取消了社會主義國家互助合作的原則，提出了這樣一種理論：每個國家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必須自力更生”。從表面上看，這種說法倒是很動聽的，因為每個國家事實上必須依靠自己的人民和力量。但是實際的計劃則是使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關係局限於貿易，並排除援助和合作關係。

每個國家都要建立自給自足的經濟。各國互相隔絕的程度甚至超過了在資本主義國家關係中所能發現的任何情況。不用說，這種政策的作用只能是延緩經濟發展的過程，特別是在較小的國家裏，這種做法的結果可能是很有害的，歷史已經表明了這一點。不仅如此，這還會使社會主義陣營四分五裂，而使帝國主義者得到好处，帝國主義者竭力利用每一種分裂作為經濟滲透的基地，並且企圖利用每一個裂痕來切斷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同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聯繫，使這些國家在經濟上依附它們。

中共領導為他們的狹隘民族主義的經濟自給自足政策辯解，他們提出的理由是，這對維持國家獨立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他們說，在援助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經濟會使自己受到援助國家的支配。顯然這是針對蘇聯的，而蘇聯的援助愈來愈受到中國政府的拒絕^①。

這首先是对蘇聯的粗暴譴責。即使在自己遇到經濟困難的情況下，蘇聯還向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爭取經濟獨立和社會主義道路的已解放的國家慷慨地提供援助。這種援助是本着人道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提供的。蘇聯的一位作者曾經這樣寫道：

“列寧在談到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根本區別時寫道：國際主義要求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服從於世界範圍的鬥爭的利益，要求已战胜資產階級的國家能夠並且願意使自己國家作出最大犧牲。”^②

社會主義世界得到目前這樣的力量和威信，民族解放運動取得巨大的進展，蘇聯的經濟技術援助是有作用的。中共主張的政策隻會按照民族原則分裂這些力量，並在各方面使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受到挫折。而且中共領導現在正在進行反蘇運動，誣蔑蘇聯是一個同美帝國主義勾結的帝國主義大國，企圖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其他國家，並且正在恢復資本主義。這種做法隻會孤立和削弱民族解放運動本身。

當然，在現實面前，中共領導人和其他黨支持他們的人不能簡單地否認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相互援助的重要性。但是，他

① 我們在這裡不能詳細談拒絕援助的原因。關於這方面的原因，請讀者參閱蘇斯洛夫的報告。《蘇共為爭取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而鬥爭》，並參閱弗林寫的題為《1960年的會議的回憶》一文，載1963年11月號《政治月刊》。

② 季塔連科：《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勝利的教導和今天》。

們根据他們的民族主义的看法歪曲这个原則。北朝鮮的一个代表在最近举行的亚洲經濟討論会上提出的報告中陈述的立場說明了这一点。^① 他提出了这样的論点：

“为了挫敗帝国主义者的新的侵略和经济渗透，并加速独立的经济的发展，維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之間的密切联系和加强他們之間的相互援助是十分重要的。”

他把这个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在内，但是完全沒有提到同社会主义世界其他地区的这种联系。因此，他所主张的是这些国家（其中大多数国家正在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经济的最起码的基础而斗争）应当只是彼此依靠，而不是依靠经济上比較先进的国家；在这些经济斗争中，这些国家的援助将具有巨大的价值。在这里，我們又可以看到狭隘民族主义是怎样設法孤立和削弱民族解放运动以及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关于“中間地帶”的理論

中共領導还強調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认为这种矛盾在今天也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間的矛盾更尖銳。它特別大大夸大了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对立，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間地帶”的概念，6月14日的信件对“中間地帶”下了这样的定义：

“美帝国主义者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条件，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一直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間的中間地帶，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

^① 南春华：《論自力更生和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的報告，載1964年6月24日的《人民朝鮮》。

革命，并且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把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和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在内，都置于美国垄断资本的奴役和控制之下。”（黑体字是作者标的。）

这包含一部分真理，因为美国金融资本争取世界霸权的冷战计划是事实。但是它进而夸大了这些计划，过分贬低其他因素，从而得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关于“中间地带”的概念不是把整个帝国主义当做敌人，而只是把美帝国主义当做敌人。它不仅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已经获得解放或正在争取解放的国家当作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盟友，而且把帝国主义世界的所有其他国家都统统算作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盟友。总而言之，世界上的中心矛盾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美帝国主义和世界上其余部分的矛盾。

在这个基础上，6月14日的信件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提出了这样的意见：

“在美帝国主义控制或者企图控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是针对美帝国主义，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

在这里我们又碰到了“爱国战线”，它现在不仅包含“某些王公贵族”，而且大概还包括克虏伯和蒂森之流，如果他们“爱国”的话。

但是，这完全歪曲了实际情况。它无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阴谋，特别是重新纳粹化的西德的复仇主义的目的，或者企图把这一切说成是美帝国主义阴谋强加于它们的政策。它还忽视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侵略性联盟，在这种联盟中，其他国家同美帝国主义一道反对社会主义世界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国人把这些特点略而不谈，而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仅仅说成是美国扩张主义的目标，中国人的立场实际上为同其他帝国主义

者結成各种各样机会主义的聯盟打开了大門，这种聯盟表面上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实际上主要是針對苏联，硬把苏联說成是美帝国主义的主要盟友和支持者。

实际上，情况同中共所說的完全相反。在資本主义国家，直接对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担子主要落在美国人民身上。在其他国家，斗争必須首先針對着它們本国的帝国主义力量，其次針對着美帝国主义。因此，西德工人阶级的主要責任是反对西德金融資本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并反对它同美帝国主义結成的反动联盟。这样一场斗争将有助于使美帝国主义失去它的盟友，并且将大大削弱它的力量以及整个世界帝国主义的力量。

這場爭論的性質

从上面所說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領導以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为名，实际上走上了直接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他們抛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則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任务，而采取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因此，目前的国际冲突不是苏联党和中国党之間的爭執，也不仅仅是就策略問題进行的一种辯論。相反地，这是一场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的思想斗争。

由于奉行它們的意识形态路线，中共領導已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这个运动現在有完全破裂的危险。这种分裂的作用是大大削弱整个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因此，迫切需要尽一切力量恢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現在按照在具体問題上采取联合行动的方針寻求这种团结可能是有成果的。但是不能沿着在思想上进行妥协的路线寻求

这种团结。在这方面，双方是不能合在一起的；同机会主义妥协就会变成机会主义者。因此只有在坚决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拒绝一切机会主义偏向的基础上最后才能实现重新统一。虽然目前看来情况也许是不好的，我们相信由于这样一场斗争的结果，最后一定能够恢复思想上的一致。

这不是一个进行抽象辩论的问题。它牵涉到在行动中，即在实际斗争中制定政策时，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当我们谈到把中共的路线与美国的实际、特别是与民权斗争结合时，问题就更加清楚了。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将要谈这个问题。

（译自1964年11月号美国《政治月刊》）